

第四章 蘇聯領導體制的演變

本章第一節探討單一領導體制下的蘇聯，從建國至 1960 年代初，蘇聯是以黨的領導人兼任行政首長，其制度的形成與問題；第二節分析布里茲涅夫當權時期「集體領導」與「二元領導」體制的形成背景，以及政治菁英對此一新制度安排的考量因素；第三節分析二元領導的蘇聯如何逐步轉變為「半總統制」的俄羅斯，以及此一制度在俄國的實踐。

在本章中，筆者希望突出蘇聯的高層權力分配，由集中而分享的過程。蘇聯的領導體制幾經反覆，列寧去世之後，蘇共黨內群龍無首，史達林起初並非黨內最高領導人；事實上，當時的體制也難以確定誰才是最高領導人，直至史達林獨攬大權。史達林去世之後，再度陷入權力分配不清的局面，直至赫魯雪夫擊敗政敵。

赫魯雪夫下臺之後，再度形成權力分享的局面；但是經過兩次教訓，蘇聯領導層通過「關於主席團內部發生的問題和在蘇共中央恢復列寧主義集體領導原則的措施的決議」，強調此後不容許一個人兼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¹從而邁出二元領導體制制度化的第一步。在此之前蘇聯的國家元首一直是無足輕重的職務，但此時地位已開始上升；到 1977 年布里茲涅夫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其後經歷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科，蘇聯似乎形成了一種總書記兼任國家元首的慣例。

戈巴契夫的上臺，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但老人政治的餘波使葛羅米科成為國家元首。然而改革的壓力與權力鬥爭，使戈巴契夫奪得總書記之後，再在接著的幾年奪得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其後變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再被選為總統。而葉爾欽的俄國，也受此過程影響而形成半總統制。

¹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從列寧到戈爾巴喬夫**（第四分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頁 18，19。

表 4-1 蘇聯領導層的職務分配演變

時間\職稱	黨書記(甲)	總理(乙)	總統(丙)	軍事(子)
1917~1922	(列寧)	列寧	加米涅夫(丁)、加里寧	列寧(托洛斯基)
1922~1924	(列寧)史達林	列寧(加米涅夫)	加里寧	列寧(托洛斯基)
1924~1925	史達林	李可夫	加里寧	加米涅夫
1926~1930	史達林	李可夫	加里寧	----
1930~1941	史達林	莫洛托夫	加里寧(戊)	----
1941~1953	史達林	史達林	什維爾尼克(己)	----
1953~1955	赫魯雪夫	馬林科夫	伏羅希洛夫	(朱可夫)
1955~1957	赫魯雪夫	布爾加寧	伏羅希洛夫	(朱可夫)
1958~1964	赫魯雪夫	赫魯雪夫	伏羅希洛夫、布里茲涅夫	----
1964~1977	布里茲涅夫	柯錫金	米高揚(庚)	----
1966~1977	布里茲涅夫	柯錫金	包戈尼	
1977~1980	布里茲涅夫	柯錫金	布里茲涅夫	----
1980~1982	布里茲涅夫	吉洪諾夫	布里茲涅夫	----
1982~1984	安德洛波夫	吉洪諾夫	安德洛波夫(辛)	(烏斯季諾夫)
1984~1985	契爾年科	吉洪諾夫	契爾年科(壬)	(烏斯季諾夫)
1985~1988	戈巴契夫	雷日科夫	葛羅米科(癸)	----
1988~1990	戈巴契夫	雷日科夫	戈巴契夫	----
1991	戈巴契夫	帕夫洛夫	戈巴契夫	----
1991~1992	----	葉爾欽	葉爾欽	----
1992	----	葉爾欽、蓋達	葉爾欽	----
1993~	----	切爾諾梅爾金	葉爾欽	----

說明：

1.(甲)蘇共總書記的權力是在史達林時期逐漸強化的，1922年之前並無明確黨首，但一般以列寧為首；1922年史達林接任總書記，1952年總書記職務廢除，史達林為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簡稱第一書記；1966年回復總書記職務。(乙)1917年起為人民委員會主席，1946年3月19日起為部長會議主席，1991年1月14日起為蘇聯總理。(丙)蘇聯元首職位，在1917至1922年是全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1922年12月30日至1938年1月12日為「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1938年1月17日起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89年5月25日至1990年3月15日為最高蘇維埃主席，1990年3月15日至1991年12月25日為蘇聯總統。(丁)雅科夫·米哈伊洛維奇·斯維爾德洛夫，於1917年11月21日至1919年3月16日擔任全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弗拉基米爾斯基，於1919年3月16日至1919年3月30日擔任全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戊)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加里寧，有稱任職至1938年7月19日；另有資料稱任職至1946年。(己)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什維爾尼克(N. M. Shvernik)，任職期間自1946年5月9日至1953年3月15日。(庚)列昂尼德·伊里奇·布里茲涅夫，任職期間自1960年5月7日至1964年7月5日；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米高揚，任職期間自1964年7月5日至1965年12月9日。(辛)其間，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庫茲涅佐夫，自1982年11月10日至1983年6月16日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壬)庫茲涅佐夫於1984年2月9日至1984年4月11日暫代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癸)庫茲涅佐夫於1985年3月5日至1985年7月27日暫代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子)蘇聯最高軍事領導職務在史達林以後皆由蘇共總書記兼任，其他政治局委

員亦參與決策，不具有獨立的政治權力基礎，因此以示以虛線；括弧內為參與權力鬥爭的國防部長。

2.資料詳見後文各表，或參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8%81%94>>，下載於 2004 年 2 月。

在蘇聯權力繼承、以及多次職務分配的故事中，我們將看到政治菁英如何藉由相對固定的職務分配模式，降低派系衝突、穩定權力結構，而此種相對固定的職務分配，又是如何地被制度化，或者疏於被制度化。

第一節 單一領導的三個經驗

從列寧、史達林到赫魯雪夫，有一共通之處，即三人都直接面對龐大的行政部門，成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或者後來的部長會議主席。史達林與赫魯雪夫是經過數年的權力鬥爭才得到此一重要職位；但他們一開始未必即有得到此一職務的願望。

列寧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可以說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當時蘇共黨內民主氣氛濃厚，人民委員會的各個委員也都可以肆言無忌。列寧挽起袖子親力親為，擔任行政部門的負責人，顯示了一種負責任的人格。

列寧死後，一開始史達林並非威望最高、亦非職務最要。但史達林利用了黨書記的角色，「聯右拉中打左」，鬥垮同輩的主要權力競爭，最後再聯合黨官僚群體的力量推倒了右派的同盟，成為黨內的獨裁者。1930 年史達林讓下一輩的莫洛托夫成為人民委員會主席；而他藉由代際政治的權威，本無需兼任行政部門的領導。但德國東侵，促使史達林集中一切權力，以調度黨政軍一切資源。

赫魯雪夫鬥倒馬林科夫後，進行了「批史」；批判史達林之餘，史達林的憲法，以及史達林的權力集中方式，都務去之而後快。然而赫魯雪夫未能實現制定新憲的願望，並且在 1957 年的權力鬥爭後，由於「反黨集團」以部長會議為基地向中央書記處鬥爭的教訓，而半推半就的成了新的單一領導。

列寧與史達林兩人的經驗，顯示危急時刻，黨書記作為國家領導人，事必躬親、掌握行政權力的必要性。赫魯雪夫的經驗顯示了「黨」與「政」發生衝突的現實可能。然而，史達林與赫魯雪夫的經驗，又都顯示了權力集中以後其他政治菁英的無力感。此種歷史經驗似乎告訴黨國體制下的政治菁英，如果現在並非國家危亡之秋，還是讓權力分散些好。

一、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

1847 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創立共產黨時，共產黨的中央是由五人組成中央委員會，並有主席一人負責召開會議；馬克思本人即曾擔任主席一職。1863 年成立「全德工人聯合會」後，拉薩爾當選主席，「最早搞個人集權、並且指定接班人」。1869 年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1875 年與全德工人聯合會合併時，就採取了兩個平行主席的「二元領導」體制，以互相牽制。1898 年俄國的共產黨成立後，²有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委員會兩個機關，並推舉普列漢諾夫為協調這兩個機關的總委員會主席。1905 年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裂後，總委員會和主席一職也都取消了。布爾什維克也沒有主席或總書記，而是選出幾個人實行集體領導。³

另一方面，俄羅斯帝國在 1906 年成立了真正的國會「杜馬」（Duma），制訂了憲法，並在新的制度下還誕生了著名的斯托雷平（Stolypin）總理的改革；⁴雖然改革未能消弭內部的不滿，但帝俄晚期所形成的二元領導體制，不免對其後

² 俄國斯共產黨，原名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1918 年 3 月舉行第七次大會時，改名為俄羅斯共產黨，下加布爾什維克的「布」字，簡稱「俄共（布）」（Russian Communist Party ）；1922 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簡稱蘇聯，即 Soviet Union）成立後，俄共（布）於 1925 年 12 月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決議改稱「全聯盟共產黨」，仍加「布」字，簡稱「聯共（布）」（All Union Communist Party ）；1952 年 10 月十九大時，再改稱蘇聯共產黨（Soviet Union Communist Party），簡稱「蘇共」。參閱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台北：五南，民 83），頁 140-141。

³ 陸南泉、姜長斌主編，*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45，146。

⁴ Levent Gönenç, *Prospects for Constitutionalism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Hague,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p. 70.

的蘇聯體制亦構成影響。

1917 年「二月革命」之後，出現了工人、士兵為主的「蘇維埃」和原議會「杜馬」成員組成的「臨時政府」兩個權力中心。同年「十月革命」成功後，雖然實際權力已掌握在蘇維埃與其行政機關「人民委員會」，但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並未立即放棄西方的議會民主，而希望能成立「立憲會議」。然而 1917 年 11 月 25 至 27 日進行的選舉結果卻很不理想，布爾什維克僅獲得 707 席中的 175 席，而社會革命黨卻獲得了一半以上的席次；於是列寧在 1918 年 1 月解散立憲會議，確定蘇維埃制度是蘇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形式」，並且展開對社會革命黨的鬥爭。⁵

蘇維埃（俄文原意為代表會議）起源於 1905 年的俄國革命，起初不過是一些指導罷工的群眾性政治組織，或說委員會。1918 年初的蘇維埃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兩屆代表大會間隔期間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⁶1918 年 7 月 10 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SFSR）憲法發佈，規定「全俄羅斯工人、農民、哥薩克、紅軍代表蘇維埃大會」為國家最高立法、行政、監察機關（第 24 條），由此大會選出少於 200 人之「全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為大會休會期間的國家最高立法、行政、監察機關（第 28 條），並由此中央執行委員會組成「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包含 18 位擔任各部門負責人的人民委員，有權力發佈法規命令並採取一切措施以履行國家的事務，並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負責。⁷雖然在這部憲法中，

⁵ 社會革命黨是過去的民粹派與左翼知識份子所組成，與農民聯繫較為廣泛，在革命後的俄國屬於「中派」；而列寧考慮到當時的蘇聯國情，提出以推翻專制制度、召開立憲會議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最低綱領」，「以民主共和制來代替沙皇專制制度」，在經濟上認為俄國的工人不是苦於資本主義，而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可以認為社會革命黨與布爾什維克之所以發生衝突的原因，是在於組織與權力，而非意識形態上的。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0-12，157，158。

⁶ 中央執行委員會起初為一院制，1923 年 7 月起為兩院制；根據 1924 年的蘇聯憲法，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包括批准政經相關法令、經濟計畫、稅收制度、貨幣制度、解決加盟共和國之間爭議、舉借外債、批准條約等。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224。

⁷ 中央執行委員會條文見第七章，第 31 條至第 36 條，人民委員會條文見第八章，第 37 條至第 48 條。相關條文參閱 Aryeh L. Ung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 A Guide to the Soviet Constitution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1), pp. 30-32.

沒有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的「主席」職務，但一般認為實際存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可被視為當時蘇俄的國家元首。

當時在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中，都包含了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人民委員會」則由列寧兼任主席。這原是一個一黨政府，雖然十月革命後「左」派社會革命黨也加入其中，佔有三分之一的席次。從一開始，人民委員會就成了權力的中樞，蘇維埃代表大會則毫無權力可言。⁸ 危機局面的升高，使權力集中也有了適當的藉口。⁹ 到 1918 年 11 月 30 日，做為蘇俄政府最高軍事指揮部門的工農國民委員會成立，列寧兼任了委員會主席的職務。¹⁰

1919 年俄共（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定了俄共（布）的黨和國家的體制。其基本結構如下：俄共（布）最高權力機關是黨代表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由 19 名委員和 8 名候補委員組成。根據「八大」的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中央委員會每月召開兩次會議，討論「一切急需解決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組織問題」。為了主持日常的政治和組織工作，俄共（布）中央設立政治局¹¹、組織局和書記處。此時的「政治局」並不是黨的權力中心，

⁸ 雖然蘇維埃已較被解散的「立憲會議」權力集中，但布爾什維克以保衛革命的需要高於一切形式約定為藉口，仍無視蘇維埃的權力。做為議會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很少開會，作為政府的「人民委員會」則總攬大權，幾乎每日必會；執委會很少開會的原因，也有認為是由於內戰因素，多數執委會成員「都到前線作戰」所致；在這樣的情形下，1917 至 1918 年間政府頒佈的 480 項法令中僅有 68 項被提交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或其中央執委會審議通過，以後政府更是經常繞過最高蘇維埃、頒佈自己規定的法律和法規；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224。此時蘇聯處於軍管狀態，因此憲法條文亦是「僅供參考」而已；參閱 Ung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p. 20.

⁹ 1918 年中，在戰爭帶來的糧食壓力下，蘇聯政府決定用徵糧隊搜刮所有的剩餘糧食，並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和約」；於是「左派」社會革命黨與社會革命黨合作，帶頭抗暴，爆發內戰，四分之三的國土不在政府的控制下，全國經濟崩潰。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政權宣佈則實行「紅色恐怖」，進一步展開鎮壓。「社會革命黨」、「立憲民主黨」和孟什維克等主要由知識份子組成的政黨代表，或被逮捕和槍斃，或者逃往國外。這裡得區分「社會革命黨」和其中的左派，或稱「左」派社會革命黨；後者在 1917 年二月革命後與布爾什維克保持密切合作。但 1918 年「左」派社會革命黨反對俄國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於是和布爾什維克決裂，1918 年 7 月 6 日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進行政變，導致了布爾什維克對其領導成員的大逮捕；不過，布爾什維克的主要領導人原本即有意實施一黨制，因此其中的因果還有待釐清。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0-12，74，158，222，227，228，232。李丹陽，「從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當代中國研究*（Princeton），1999 年第 4 期（總第 67 期），<<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990410&total=67#b5>>。

¹⁰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一分冊），頁 158。

¹¹ 十月革命前夕，俄共（布）曾成立了「政治局」，但不久就取消了，至 1919 年的俄共（布）八大之才正式成立。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45，146，234。

而是和「組織局」並列的黨中央委員會的兩個執行機關。組織局負責人事的調配，政治局負責政治工作，主要是政策的執行和具體政策的制定。

政治局由五位中央委員組成，每週召開一次會議，「對不容拖延的問題做出決定」。組織局也由五位中央委員組成，每週至少召開三次會議，「指導黨的全部組織工作」，組織局並主管中央鼓動宣傳部、登記和分配部、黨的新聞部等部門。書記處由一名責任書記（由組織局成員擔任）和五名負責處理日常事務的書記組成。

由於此一決議要求黨組織「在勞動者的一切組織（工會、合作社、農業公社等）中起決定性的影響和掌握全部領導」，並號召黨在國家組織-----蘇維埃中實現自己的全部統治，因此俄共中共的權力就隨著黨組織的擴散，而同時擴大到各個機關，如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當時法律規定的最高立法機關），以及人民委員會（當時的最高行政機關）；於是作為國家立法機關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只是為批准俄共（布）中央起草的法案，人民委員會也演變為主席為首的一人領導制。¹²因此列寧曾強調要把「黨政分開」，指出「人民委員會和政治局之間很多事情都是通過我個人聯繫的。一旦我離開工作，兩個輪子立刻就不能動了」。

13

1920 年俄共（布）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同中央委員會平行的監察委員會」，並做出了許多相關規定，但是這個監察機關不足以遏阻腐敗，反而常被用作權力鬥爭的工具。¹⁴當時的民主風氣使俄共黨內的派系運作頗為興盛，黨內出現「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並在 1921 年春天發生了軍事暴動。於是 1921 年在內戰結束，並轉向「新經濟政策」的背景下，禁止了黨內的派系，蘇聯的黨內民主開始急遽萎縮。¹⁵

¹²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46，234-235。

¹³ **列寧選集**（中文第三版）第四卷，頁 696；轉引自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233。

¹⁴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239。

¹⁵ 1921 年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主張「黨的統一，黨員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團結一致，是黨內生活不可違背的準則」，因此要求解散黨內的所有小集團，

表 4-2 1922 年 4 月的政治局成員

成員	英文名	生年	入黨年	職務
加米涅夫	L. B. Kamenev	1883	1901	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莫斯科蘇維埃主席
列寧	V. I. Lenin	1870	1893	人民委員會主席
李可夫	A. I. Rykov	1881	1899	人民委員會副主席
史達林	I. V. Stalin	1879	1898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民族人民委員、工農監察人民委員
托姆斯基	M. P. Tomsy	1880	1904	工會理事會主席
托洛斯基	L. D. Trotskiy	1879	1917	戰爭人民委員
季諾維也夫	G. E. Zinoviev	1883	1901	共產國際主席、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
候補成員				
布哈林	N. I. Bukharin	1888	1906	真理報主編
加里寧	M. I. Kalinin	1875	1898	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莫洛托夫	V. M. Molotov	1890	1906	中央委員會書記

資料來源：Borys Levytsky, *The Soviet Political Elite* (Stanford: The Hoover Institution, 1970), pp. 745-747. 轉引自 Jerry F. Hough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3. 排名按照英文姓名順序。

總體而言，雖然列寧身兼黨的領導人、國家行政首腦、軍事的最高負責人，但蘇共黨內存在許多與他同等資深的領導人，可以形成對他的制衡；因此當時的蘇維埃國家行政機關，以及蘇共本身，都能夠維持黨內的民主。列寧與其他人民委員會委員和黨的政治局委員一樣，每人一票、平等表決。十月革命後列寧執政的六年時間內，也穩定的召開了六次黨代表大會，維持了黨代表大會的年會制；在黨代表大會之間還召開黨的「代表會議」；中央全會也按規定召開，維持了蘇共黨內的基本民主程序。¹⁶然而，此一時期未能制訂出明確的領導人任職年齡限制，加上黨內路線的爭議，使蘇共的黨內鬥爭在之後的十餘年走向惡性發展。

並從此不允許派別活動，否則立刻無條件開除出黨。此一決議開創了把黨內分歧視為「分裂黨」的前奏，使共產黨內的「民主生活」不能展開。列寧雖然認識到此一危險，但為了控制「新經濟政策」引起的爭執，仍將之視為是一個臨時性措施，並推動此決議通過。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39，236，237。另參閱資中筠主編，*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啓示錄*（下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年），頁 64。

¹⁶ 例如為了解決國內問題，列寧決定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和約時，雖然連續四次未能爭取到多數支持，只能不斷繼續說服、並再重新表決，才終於在最後贏得多數人支持。大陸學者強調，列寧雖然反對派別活動，但贊成黨內民主自由。高放認為，由於列寧在黨政兩個委員會都接受一人一票表決、在 1917 年還未執政前就提出應限制領導人的年齡、且未指定「接班人」，因此符合「制約制、限任制和選舉制」的「民主」的條件。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39，143-148。

二、總書記史達林

1922 年俄共十一大後史達林成爲總書記，其俄文意義即「秘書長」。史達林並未因「總書記」一職成爲黨的最高領導人，身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和政治局委員的列寧才是俄共的公認領袖。¹⁷作爲「秘書長」的史達林只是黨內領導層的平等的成員之一。

當時的背景，是蘇聯內戰逐漸進入尾聲，「蘇俄」在 1922 年開始變成「蘇聯」，¹⁸中央執行委員會開始修訂憲法的工作，並在 1923 年 7 月通過了新的憲法，此憲法在 1924 年 1 月 31 日由第二屆全聯盟蘇維埃大會制訂通過。在此一憲法中明確了「蘇維埃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作爲國家元首，以及「人民委員會主席」作爲行政部門領導人的身份，規定人民委員會包含主席、副主席以及十位人民委員（第 37 條）。¹⁹同時隨著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實施，「人民委員會」下屬的官僚機構開始膨脹，官僚在蘇聯體制中的角色也開始上升。²⁰

在 1922 年到 1924 年列寧去世之間，蘇聯陸海軍人民委員會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斯基是聲望最高的領導人，並受到列寧愈來愈大的器重。當時托洛斯基的地位極高，以致於一位黨中央委員形容「大家都有一種迷信，以爲托洛斯基是不可觸犯的人物……他可以任意寫文章，他的文章報紙還不能不登。他政治局排有固定的席位，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這個位置似乎是終身的」；²¹而布哈林則在回答托洛斯基所稱黨內論戰不夠民主時稱，「我們不夠民主，因爲我們怕您」。

22

然而托洛斯基的實權還是有限的。當時由於列寧已難以工作，實際負責黨務和國家行政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加米涅

¹⁷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46。

¹⁸ 正式國名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或譯聯邦）（USSR）。

¹⁹ 關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見第四章與第五章，第 13 條至第 36 條；人民委員會的職權，見第六章，第 37 條至第 42 條。相關條文參閱 Ung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pp. 63-68.

²⁰ Ung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pp. 45-59.

²¹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頁 27。

²²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一分冊），頁 442。

夫；另兩位在黨內最有影響的是身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列寧格勒蘇維埃主席的季諾維也夫，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局委員、中央總書記的史達林。²³雖然前兩者當時的政治影響力大於史達林，但史達林保持審慎低調，並以中央組織局為其權力的基地，在政治局、書記處、中央委員會都有同盟者，因此佔有一個很好的地位。²⁴

除了上述四人，政治局中另有兩人，即李可夫，以及托姆斯基。另外聲望極高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布哈林則以清高正直著稱，不參與權力鬥爭。由於在政治局中的七人，除了列寧支持托洛斯基之外，其他五人與托洛斯基都有大小不等的分歧，因此使托洛斯基在 1923、1924 年的權力鬥爭中陷入孤立。²⁵

1924 年列寧死後，中央全會召開，當時托洛斯基在高加索養病，因此未能參加。會議通過由李可夫接任列寧的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加米涅夫接任列寧的勞動國防委員會主席（相當於中共軍委主席）的職務。當年年中，史達林、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在一場包括 25 名中央委員和所有政治局委員的會議中，成為黨「領導核心」的「三人小組」；顯示出當時不僅在職務分配上、且在權力實質上都曾出現「多元領導」的狀況。也是在這一年，托洛斯基將權力鬥爭矛頭對準了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季、加兩人亦激憤回應，於是原來權力最高的三人兩敗俱傷，史達林的地位進一步提升；1925 年 1 月 26 日，蘇聯中央執委會主席團決定解除托洛斯基陸海軍人民委員會（相當於國防部長）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相當於參謀總長）的職務，由伏龍芝（M. Frunze）接任；²⁶同年伏龍芝過世，

²³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一分冊），頁 441。

²⁴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一分冊），頁 443。另參閱畢英賢編，*蘇聯*（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 年），頁 190。關於托洛斯基被鬥爭的過程，可參閱李永全，*俄國政黨史——權力金字塔的形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年），頁 384。與政治局內多數搖筆桿、曾滯居國外的多數成員不同，史達林與黨內知識不高、出身微賤、沒有到過外國、對理論興趣不大的實際工作者更容易親近，使他逐漸掌握了黨內的多數；參閱 Jerry F. Hough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12-115. 從列寧到史達林死亡這段期間的蘇聯主要人物履歷，可參同書，頁 121-137。

²⁵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一分冊），頁 444。有趣的是，布哈林也提出過農民「發財吧」這樣的口號來說明新經濟政策，彷彿鄧小平 1978 年的改革開放「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先聲。

²⁶ 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策動了列寧格勒州委以及共青團「撤銷托洛斯基黨籍」，但由於史達林以及其他黨中央成員的反對並未實現。到 1925 年初托洛斯基被鬥下臺後，被任命擔任租借權委

此一職務轉交伏羅希洛夫 (K. E. Voroshilov)。伏羅希洛夫在內戰時期是第十軍團的司令，而史達林則是政委，兩人之間的密切關係使史達林在權力鬥爭中據有一個極佳的地位。²⁷

托洛斯基下臺後，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原本與史達林存在的矛盾衝突就尖銳化了。經過幾場鬥爭，到 1925 年底的聯共（布）十四大召開時，史達林以黨的最高領袖的面貌作政治報告，而前兩屆黨的名義上最高領袖季諾維也夫則只能作副報告。會上的權力鬥爭中，加、季兩人遭到慘敗。會後不久，加米涅夫被解除勞動國防委員會主席職務、並降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季諾維也夫被解除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列寧格勒黨委第一書記以及列寧格勒蘇維埃主席的職務。²⁸

1926 年 6 月，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和托洛斯基達成了妥協，形成了一個以托洛斯基的政治觀點為主的反對派（托季聯盟）；但他們不只在中央領導層是弱勢，在群眾中也未能得到迴響，經濟的穩定發展以及托季聯盟政治上的投機性，使反對聯盟很快失敗，7 月季諾維也夫即被開除出中央政治局，10 月的黨中央聯席會議上，托洛斯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的候補委員職務被撤銷了。²⁹雖然 1927 年托季聯盟仍有所反擊，甚至走上街頭，到年底的十五大，托洛斯基、加米涅夫等人都被開除出黨。³⁰

於是史達林先利用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與托洛斯基的矛盾，將托洛斯基從權力核心排擠出去；再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聯合起來，把季諾維也夫、

員會主席、電氣技術管理局局長、工業科學技術院院長；這三個職務都是行政技術方面的職務，沒有多少權力。雙方鬥爭過程，參閱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頁 4-13，22-28，51。此處的三個層次軍事職務，勞動國防委員會是蘇共中央的政治局領導人之間的分工，介於今日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國防領導小組」與「中央軍委」之間；陸海軍人民委員會是人民委員會的分支機關，相當於我國行政院或中國大陸國務院下的國防部；革命軍事委員會是國防部的諮詢與政策檢討機構，其主席相當於參謀總長；以上三個機構的翻譯在不同段落依據邢廣程著作翻譯，畢英賢另有不同譯文；內容參閱畢英賢，**蘇聯**，頁 496-510。

²⁷ 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p. 196. 林國忠，**蘇聯黨軍關係之研究（1918-1964）**（台北：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論文，民國 76 年），頁 16。

²⁸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頁 48-72。伏羅希洛夫後擔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下設的國防委員會（陸海軍人民委員會）主席；同書，頁 388。在此過程中，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以及「不要急於工業化、不要與農民爭吵、不要依賴世界革命」，保護黨官僚的威權的政策，既使史達林贏得廣大官僚支持，也聯合了布哈林之類蘇共內部的「右派」。

²⁹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頁 92-98。

³⁰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頁 127-147。

加米涅夫與托洛斯基的聯盟整垮。隨後在 1927 年發生的糧食危機，使史達林提出與托洛斯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相同的「貢稅論」，企圖以農業集體化加速發展重工業，而此一政策方向和布哈林所捍衛的新經濟政策相衝突，兩人在 1928 年 7 月的中央全會上衝突，史達林再次得到勝利；由於共產國際首領布哈林、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托姆斯基，以及人民委員會主席李可夫都反對史達林的此一可能導致內戰的政策，於是被史達林稱為「布哈林集團」鬥垮，1930 年再將身任政治局委員的人民委員會主席李可夫開除出政治局、並解除其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³¹布哈林下臺後，同年底史達林取消了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重新回到被列寧否定的戰時共產主義模式，並在整個國家內推動階級鬥爭，進行大鎮壓。³²於是 1929 年常被視為是蘇聯早期的黨內民主，轉變為史達林個人獨裁的一年。³³

1934 年初召開了第十七次蘇共代表大會。³⁴此次會議召開之前，黨內普遍要求緩和政治氣氛，擴寬黨內民主；很多中央委員希望選舉性格寬容的列寧格勒黨委書記基洛夫（Sergey M. Kirov, 1886-1934）擔任總書記，但基洛夫堅決拒絕。史達林知道後，在 1934 年 12 月製造了基洛夫被刺殺的疑案，³⁵之後更以基洛夫

³¹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頁 167-195。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台北：南方叢書，民 76），頁 36，37，248。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49。李永全，**俄國政黨史**，頁 384，385。布哈林是在 1926 年底季諾維也夫被解除共產國際主席後成為此一組織的領導人；參閱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頁 117。

³² 當時蘇聯黨內鬥爭是圍繞著一個理論問題展開，即是否應繼續「新經濟政策」。以布哈林為代表的一派認為，應繼續實施新經濟政策，放慢工業化並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另一派以托洛斯基為代表，認為在沒有歐洲發達國家援助的情況下，為了積累建設資金，可實施剝奪農民的政策；這兩種思路在 1920 年代未形成共識，使國家政策不斷變化。由於政策不穩定，因此 1923 年工業產品降價以促進銷售，1924 年又調低糧價希望節省政府財政支出，結果糧食收購不足，1925 年又開放市場使農業興旺，1926 年又是壓低糧價造成農業損失，1927 年工業產品降價卻又使工業生產劇降，工農皆表不滿，政府亦無力蒐購糧食，1928 年政府乃又決定對富裕農民採取「非常措施」。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41，48，78，79。

³³ 例如由 Robert H. McNeal 編輯的「蘇聯共產黨決議與決定」(*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系列叢書，即以該年作為第二卷「早期蘇維埃時期」與第三卷「史達林歲月」的斷代年份。但在此之前，蘇共的權力中心已經由黨代表大會轉移到政治局，黨代表大會的年會制從 1925 年開始即不復能維持，且會議間隔時間愈拉愈長。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47。

³⁴ 本次大會修改黨章，把原由黨代大會領導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改為歸屬中央委員會領導，其任務亦改為監督地方黨委是否執行中央的決議，於是此後亦無任何機關可以監督蘇共中央領導人；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47。

³⁵ 在蘇共十七大選舉黨中央時，基洛夫差 3 票即全票當選，但有數百人不支持史達林，也引起

被刺殺為藉口，掀起 1935 至 1938 年間的「大整肅」。³⁶

表 4-3 1934 年 2 月的政治局成員

成員	英文名	生年	入黨年	職務
安得烈耶夫	A. A. Andreev	1895	1914	鐵路人民委員
卡岡諾維奇	L. M. Kaganovich	1893	1911	中央委員會及莫斯科黨書記
加里寧	M. I. Kalinin	1875	1898	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基洛夫	S. M. Kirov	1886	1904	中央委員會及列寧格勒黨書記
柯西歐	S. V. Kosior	1889	1907	中央委員會及烏克蘭黨書記
古比雪夫	V. V. Kuibyshev	1888	1904	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莫洛托夫	V. M. Molotov	1890	1906	人民委員會主席
柯索尼基迪斯	G. K. Ordzhonikidze	1886	1903	重工業人民委員
史達林	I. V. Stalin	1879	1898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伏羅希洛夫	K. E. Voroshilov	1881	1903	國防人民委員
候補成員				
朱巴爾	V. Ia. Chubar	1891	1907	烏克蘭人民委員會主席
米高揚	A. I. Mikoian	1895	1915	食品工業人民委員
佩特羅夫斯基	G. I. Petrovsky	1878	1897	烏克蘭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波斯提雪夫	P. P. Postyshev	1887	1904	烏克蘭黨第二書記、基輔黨第一書記
魯茲塔克	Ia. E. Rudzutak	1887	1905	人民委員會副主席

資料來源：Borys Levytsky, *The Soviet Political Elite* (Stanford: The Hoover Institution, 1970), pp. 745-747. 轉引自 Jerry F. Hough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57-158. 排名按照英文姓名順序。

在這樣的氣氛中，1935 年聯共（布）中央二月全會通過決議，委託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提出修憲案；³⁷ 1936 年 12 月 5 日頒佈了蘇聯新憲法（又稱史達林憲法），設立了兩院制的最高蘇維埃，在最高蘇維埃之上組成包含包含 1 位主席及 11 位副主席、秘書與 24 位成員的「主席團」（第 48 條）。主席團有權召開最高蘇維埃、解釋法律、在最高蘇維埃兩院衝突時解散最高蘇維埃並重新

史達林的極大不滿；關於基洛夫事件：參閱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頁 313-319。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36-37。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59。

³⁶ 大整肅期間，蘇共十七大選出之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 139 人中，有 98 人被捕和槍決，與會代表 1966 人中，有 1108 人被捕和槍決；蘇軍高級將領中，5 名元帥中的 3 名，軍團長 19 名中的 13 名，軍長 85 名中的 57 名，師長 195 名中的 111 名，旅長 406 名中的 220 名被整肅；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包括季諾維也夫、加米諾夫、布哈林等都未能倖免；包括平民百姓被殺者估計有一千五百萬人。這些數據多來自 1956 年 2 月蘇共二十大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參閱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15；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36-37。吳稼祥批評史達林由於威望過低、手段過辣，因此消滅了整個第二把手集團、所有可能威脅他的權威的人；參閱吳稼祥，*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台北：聯經，2001 年），頁 58。

³⁷ 劉向文，*俄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2002 年），頁 10。

選舉、發起公投、撤銷人民委員會頒佈之法規命令、應人民委員會主席要求重新任命個別人民委員、給予榮典、特赦、任命軍隊總司令、宣戰、發佈動員、批准條約、任命使節、接受外國使節（第 49 條）。與此同時，人民委員會則從附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獨立的「最高行政管理機關」（第 64 條）。³⁸

蘇聯 1936 年的憲法，在體制上已較前兩部憲法成熟許多。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權力已經提高，例如當最高蘇維埃兩院無法妥協時，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可以下令解散蘇維埃、舉行新選舉，³⁹不過當時的最高蘇維埃主席是加里寧，其政治地位則並不高，因此最高蘇維埃此時仍僅是「橡皮圖章」。⁴⁰ 1938 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將史達林的理論體系規定為全蘇聯與第三國際的馬克斯主義教條，即顯示了史達林的權勢。⁴¹

另一方面，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權則在蘇聯實施計畫經濟的過程中提高，但史達林已將同一世代的政敵消滅，屬於下一世代、擁有實權的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不過其僚屬。雖然如此，到 1941 年德軍攻入俄國後，為集中一切力量抵抗德國，史達林乃將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亦攬在身上，於是形成「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人民委員會主席、最高統帥、國防委員會主席、大本營主席、國防人民委員」等職務集於一身的狀況。⁴²

史達林執政晚期已顯示出蘇聯亟需改革，但由於二戰勝利的興奮以及領導人思維與體制的僵化，改革未能有所進展。⁴³到史達林晚年，蘇聯主要以政府機構

³⁸ 關於最高蘇維埃，見本憲法第三章，第 30 條至第 56 條；人民委員會見第五章，第 64 條至第 78 條；相關條文參閱 Ung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pp. 144-150. 到 1947 年 2 月 25 日修憲，人民委員會正式改名為「部長會議」，參閱 Ung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p. 163. 另參閱畢英賢，*蘇聯*，頁 237。

³⁹ 費因索德（Merle Fainsod），劉光炎譯，*蘇俄政制剖析*（台北：中華文化，民 45）頁 149。

⁴⁰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五分冊），頁 658-661，673。

⁴¹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50。

⁴² 芮斯塔（John S. Reshetar），趙先運譯，*俄共簡史*（台北：政工幹部學校，1965 年），頁 290。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二分冊），頁 408。「國防委員會」（State Defense Committee）成員包括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大本營」（Supreme Headquarters）負責戰時的實際軍事行動，史達林以此為其辦公室；參閱 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p. 178。

⁴³ 史達林時期提出改革主張的領導人，例如 1947 年時擔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的沃茲涅辛斯基，卻因此被撤職乃至處決；1950 年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領導全蘇聯農業工作的安德列耶夫則由於支持「包產到組」的實驗而被排擠出政治局。陸

為中心進行活動，中央全會往往數年不召開一次會議，主席團（政治局）會議也不正常召開，黨的機構失去了應有的作用，因此就使「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突出於黨的職務之上。⁴⁴1952 年的蘇共十九屆一中全會上，史達林提議設立由 25 名正式委員和 11 名候補委員組成的「蘇共中央主席團」以取代原來的政治局，取消了「總書記」一職，並把書記處書記由 5 人增為 10 人，史達林成為排名第一的書記處書記。⁴⁵

雖然有學者認為史達林時期的統治，是徹底的專制，⁴⁶加上其克里斯瑪的人格化權威，因此使次級菁英群體俯首聽命；但是政治菁英的聽命，實乃是由於歷次整肅帶來的恐懼感，以及克格勃（KGB）的跟蹤和監視。⁴⁷史達林的死亡，以及緊接著的赫魯雪夫時期的權力鬥爭，降低了情治系統對最高領導層的壓力，使蘇共領導層的關係，由「人格化權威結構」轉變為「後強人權力結構」。

三、赫魯雪夫的單一領導

1952 年，史達林死前五個月的蘇共十九大上，排名在史達林之後的中央全會主席團（即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以及部長會議副主席，都是馬林科夫（George M. Malenkov, 1902-1988）。馬林科夫並且代表中央委員會在十九大上做政治報告；很顯然的，馬林科夫是史達林的「接班人」。因此在史達林死後，

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86。

⁴⁴ Archie Brown, "The Power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SU," in T. H. Rigby, Archie Brown and Peter Reddaway ed. *Authority,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USSR*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 p. 138.

⁴⁵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91。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 7。

⁴⁶ 學者指出，史達林實行「個人集權制」，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既是黨的總書記、部長會議主席，又是全軍武裝部隊總司令、最高統帥；史達林還搞領導職務終身制，任職至 1953 年 73 歲死時；他並指定馬林科夫為接班人，因此他以「個人集權制、領導職務終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徹底違反了民主制度的「制約制、限任制和選舉制」要求，加上他還加強了「黨政不分制度、幹部等級授權制度和高幹特權制度」，因此是徹底的專制。除了這六種制度外，在黨務上史達林還推行了「政治局中心制、監察機關附屬制、取締不同意見制」，因此更加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說」。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43，144。

⁴⁷ 克格勃（KGB）的跟蹤和監視，使蘇共領導人之間形成一種不存在私人友誼，家庭之間也不保持密切聯繫的心理障礙；這種狀況至戈巴契夫時期依然如此。參閱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蕭敏、王為等譯，*信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年），頁 698，699。

馬林科夫接替了部長會議主席、排名第一的書記處書記等職務。⁴⁸

由於在史達林晚期以部長會議主席的身份實行直接統治，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主席團）權力有限，因此 1953 年 3 月 21 日的中央委員會常會，馬林科夫就自願辭去蘇共中央委員會排名第一的書記職務，讓在黨內僅排名第五的原莫斯科市委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 1894-1971）接替他擔任第一書記。當時排名在赫魯雪夫之前的除了擔任部長會議主席的馬林科夫，還有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內務部長貝利亞（Lavrentiy P. Beria, 1899-1953）、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Marshal K.E. Voroshilov）等人，緊接在後的則是在赫魯雪夫倡議下新任命的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布爾加寧（N. A. Bulganin），以及其他數人。馬林科夫、貝利亞和莫洛托夫是當時真正具有權力的「三駕馬車」。⁴⁹

表 4-4 1953 年 3 月的蘇共主席團成員

成員	英文名	生年	入黨年	職務
馬林科夫	G. M. Malenkov	1902	1920	部長會議主席
貝利亞	L. P. Beria	1899	1917	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內務部長
莫洛托夫	V. M. Molotov	1890	1906	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外交部長
伏羅希洛夫	K. E. Voroshilov	1881	1903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赫魯雪夫	N. S. Khrushchev	1894	1918	中央委員會書記
布爾加寧	N. A. Bulganin	1895	1917	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
卡岡諾維奇	L. M. Kaganovich	1889	1905	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米高揚	A. I. Mikoian	1895	1915	部長會議副主席、內政與外貿部長
薩布洛夫	M. Z. Saburov	1900	1920	機械工業部長
波烏金	M. G. Pervukhin	1904	1919	電站與電子工業部長
候補成員				
什維爾尼克	N. M. Shvernik	1888	1905	全聯盟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
波諾馬仁科	P. K. Ponomarenko	1902	1925	文化部長
梅尼可夫	L. G. Melnikov	1906	1928	烏克蘭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巴基洛夫	M. D. Bagirov	1896	1917	阿賽拜疆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資料來源：真理報 (Pravda)，1953 年 3 月 7 日，第 1 版。轉引自：Jerry F. Hough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97-198. 此表卡岡諾維奇生年與入黨年與前表不同，是原書資料差異。

⁴⁸ 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 2。芮斯塔，俄共簡史，頁 270。

⁴⁹ 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 4-7。芮斯塔，俄共簡史，頁 272-273。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三分冊），頁 7，8。趙春山，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從列寧到戈巴契夫（台北：桂冠，1990 年），頁 50。當時的研究者也指出，馬林科夫以部長會議主席身份掌權，顯示史達林以總書記身份崛起的歷史，未必能作為未來的參考；參閱熱西達 (John S. Reshetar)，殷海光譯，怎樣研究蘇俄（台北：桂冠，1990 年），頁 185。

1953年6月，在赫魯雪夫的主導下，加上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以及國防部長布爾加寧等，一起共謀製造貝利亞事件，並清算貝利亞領導的情治系統。⁵⁰此一事件之後，赫魯雪夫在黨內的地位從第五提升到第三位。七月召開中央全會，提出加強黨的領導、提高中央委員會的作用，也讓赫魯雪夫主管的書記處權力增加。赫魯雪夫並在1953年9月的蘇共中央全會正式成爲蘇共第一書記。⁵¹

在排名第二的貝利亞被清除之後，在短暫的期間內維持了權力的穩定；由於沒有一個領導人享有史達林的政治實力，集體領導成爲無可避免的發展。⁵²但赫魯雪夫由於在平反冤案、經濟改革、外交上的許多積極作爲，使他的聲譽日增，與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的權力矛盾也日漸增加。⁵³

馬林科夫在史達林時代的後期負責幹部工作，進行了許多人事任命，⁵⁴原本這應有利於其在史達林之後的掌權。然而馬林科夫卻又由於身居中央、排名高居第二，因此也製造了許多冤案，例如「列寧格勒案」；這使其在史達林之後的「平反」風中陷於被動。⁵⁵

另一方面，當時的領導人，包括馬林科夫都認爲領導蘇聯政府、主持政治局

⁵⁰ 清算貝利亞的過程，參閱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10-29。在此之後，1954年4月28日赫魯雪夫提議將國家政治保安部（Gosudarstvennoe Politicheskoe Upravlenie/Stat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GPU, 格別烏）改組爲部長會議下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omitet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KGB/State Security Committee, 克格勃）；第一任主席爲謝洛夫（I. A. Sherov），其任職期間從1954年4月至1958年12月8日；詳情參閱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41, 335-364；體制變化可參閱Ung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pp. 21, 52, 71, 212。此一鬥爭過程，另參閱佩特羅夫（Koytcho Petrov），葛志強、馬細譜等譯，*戈爾巴喬夫現象-----改革年代：蘇聯東歐與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年），頁180-181。

⁵¹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40。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28, 29。

⁵² 趙春山，*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頁50。

⁵³ 參閱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30-66。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pp. 194-209。

⁵⁴ 普里馬科夫，*大政治年代*（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頁5。

⁵⁵ 當時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庫茲涅佐夫（Kuznetsov）似乎有成爲史達林新的接班人的可能，因此馬林科夫製造「列寧格勒案」，造成庫茲涅佐夫以及多名高官被判死刑；但亦有文章認爲，列寧格勒在二次大戰之中產生的基洛夫的讚美、對史達林的視若無睹，才使史達林欲清洗列寧格勒出身的政治菁英。此案於1954年4月30日在赫魯雪夫的努力下獲得平反。其他許多冤案，也都使馬林科夫必須承擔史達林時期恐怖鎮壓的罪責。參閱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31, 67。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70年*（第二分冊），頁450-455。

會議，就是擁有了絕對的權力，因此才會在史達林死後，讓排名第五的赫魯雪夫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並主管書記處的權勢龐大的機關。其後的演變說明，由於中央書記處與地方黨委以及其他組織有著緊密的聯繫，在形勢不明朗的時期，地方組織總是跟隨中央機關而非政府和國家領導人，因此掌握此一機關事實上在政治鬥爭時極為重要。⁵⁶

1955年2月，馬林科夫被赫魯雪夫鬥倒，辭去了部長會議主席的職位，由布爾加寧接替。⁵⁷當時「沒有哪一個人被公認為是蘇聯的領袖，雖然許多人有這個野心，但卻沒有一個明確而公認的絕對權威」，⁵⁸因此可說是一段較為平等的「二元領導」時期；例如在1955年5月訪問南斯拉夫時，以及7月的日內瓦美英法蘇四國高峰會上，赫魯雪夫與布爾加寧都聯袂出席。⁵⁹雖然1956年2月召開蘇共「二十大」時，是由身任第一書記的赫魯雪夫代表中央委員會，向大會進行政治報告；但由於經過前述鬥爭，加上主席團委員的名次排列是按照字母順序，黨內的排名並不清晰，是其他領導人以「黨內慣例」為由謙讓，才使赫魯雪夫成為報告人。⁶⁰

赫魯雪夫將馬林科夫鬥下臺後，雖然實質上成為黨內最重要的領導人，但他已得罪了馬林科夫；赫魯雪夫未安排原本排名第二的莫洛托夫接替馬林科夫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並在馬林科夫下臺後將鬥爭矛頭對準莫洛托夫，因此與莫洛托夫亦積怨頗深；而雖然赫魯雪夫推薦其密友布爾加寧擔任掌握大權的部長會議主席，但此後對他頤指氣使，於是布爾加寧對赫魯雪夫亦有怨氣。再加上政策的差

⁵⁶ 貝利亞即曾嘲笑當時的中央書記處是主管「宣傳」和「幹部」事務的部門，參閱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7，8，24。日後戈巴契夫的政敵也由於類似的原因，輕率的讓戈巴契夫成為總書記，最終都被戈巴契夫所鬥倒；參閱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頁76。1954年4月的蘇共中央組成，可參閱 Frederick C. Barghoom, *the USSR*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6), p. 399.

⁵⁷ 馬林科夫辭去部長會議主席後，仍為部長會議副主席；黨內排名第二的莫洛托夫在此次鬥爭中旁觀，原以為可以得到部長會議主席一職，未料赫魯雪夫推薦布爾加寧，最終使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在1957年形成以打倒赫魯雪夫為目的的「反黨集團」。關於馬林科夫辭職前後政治狀況，以及相關歷史，參閱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66-75。

⁵⁸ 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108。

⁵⁹ 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54，62。

⁶⁰ 蘇共二十大的批史報告，對各國共黨都造成巨大影響，赫魯雪夫的政治聲望也受到打擊。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107-42。

異，以及「平反」過程帶來的政治壓力，使「主席團」中的許多委員都對他不滿。以莫洛托夫為首的這些委員於是形成一個小團體，在 1957 年 6 月 18 至 21 日的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提出要解除赫魯雪夫的第一書記的職務。

然而在中央主席團的多數，並未使莫洛托夫等贏得勝利；赫魯雪夫讓各地中央委員趕回莫斯科，以數十位中央委員聲稱要自行召開中央委員會，向主席團施壓，迫使莫洛托夫等讓步，最終在中央委員會上，迫使馬林科夫與莫洛托夫等人承認是進行派別活動；於是在 6 月 29 日中央委員會上，馬林科夫等人被定性為「反黨集團」（Anti-Party Group），被撤除職務。⁶¹經過 7 月整肅，10 月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也由於權勢過大去職，赫魯雪夫至此終於建立了個人的絕對權威。

62

由於在 1957 年六月的鬥爭中，中央主席團委員內，擔任部長會議的所有正副主席除米高揚（A. I. Mikoyan）外全都站在一起，中央書記處的書記除謝皮洛夫外也同樣團結一致，形成明顯的「兩軍對壘」的陣勢；而當時的部長會議主席，還是赫魯雪夫所推薦的好友布爾加寧。這就使赫魯雪夫不得不得出結論，即除非他自兼部長會議主席一職，否則很難避免其他領導人以部長會議為基地，向擔任第一書記的赫魯雪夫挑戰。在此考量下，赫魯雪夫乃於 1958 年 3 月 27 日至 31 日的第五屆最高蘇維埃第一次會議上，接替布爾加寧，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一職；伏羅希洛夫則連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⁶³

史達林獨裁的經驗，使當時的政治菁英已有一種對於權力過於集中於一人的警惕。但由於黨內鬥爭，使赫魯雪夫最終覺得應由自己擔任部長會議主席。當時其他領導人，也由於以下原因，支持此一決定。其一，政治菁英希望藉此避免最

⁶¹ 布爾加寧則是到隔年 3 月才被撤職。參閱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 173-216，231。畢英賢，**蘇聯**，頁 92-93。此次權力鬥爭中「中央委員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凸顯了中央委員會所包含的權力授與和「合法性」功能，此後蘇共權力接班亦雖仍決定於政治局，但也都經過中央委員會的確認；參閱 Baruch A. Hazan, *From Brezhnev to Gorbachev – Infighting in the Kremli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p. 5.

⁶² 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 216-228。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40。

⁶³ 形式上，是伏羅希洛夫先被選舉成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之後，再由其提議赫魯雪夫為部長會議主席，並由最高蘇維埃選舉通過。參閱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 228-233。畢英賢，**蘇聯**，頁 93。芮斯塔，**俄共簡史**，頁 290。

高層的衝突，造成其他領導人的不測之禍；其次，馬林科夫和布爾加寧的悲慘命運，也讓許多人望部長會議主席一職卻步；其三，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希望擴權後的赫魯雪夫更容易提拔他們；其四，如果部長會議主席，總在權力鬥爭中失敗，於是部長會議的其他領導人認為不如讓第一書記赫魯雪夫也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以拉近與赫魯雪夫的距離。⁶⁴

表 4-5 1957 年 12 月的蘇共主席團成員

成員	英文名	生年	入黨年	職務
赫魯雪夫	N. S. Khrushchev	1894	1918	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亞瑞斯托夫	A. B. Aristov	1903	1921	中央委員會書記、RSFSR 中央局副主席
布里茲涅夫	L. I. Brezhnev	1906	1931	中央委員會書記
弗爾茨瓦	E. A. Furtseva	1910	1930	中央委員會書記
伊格納托夫	N. G. Ignatov	1901	1924	中央委員會書記
基里臣科	A. I. Kirichenko	1908	1930	中央委員會書記
庫斯年	O. V. Kuusinen	1881	1904	中央委員會書記
穆基迪諾夫	N. A. Mukhidinov	1917	1942	中央委員會書記
蘇斯洛夫	M. A. Suslov	1902	1921	中央委員會書記
什維爾尼克	N. M. Shvernik	1888	1905	監察委員會主席
貝里亞耶夫	N. I. Beliaev	1903	1921	哈薩克斯坦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伏羅希洛夫	K. E. Voroshilov	1881	1903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布爾加寧	N. A. Bulganin	1895	1917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米高揚	A. I. Mikoian	1895	1915	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柯茲洛夫	F. R. Kozlov	1908	1926	RSFSR 部長會議主席
候補成員				
波斯佩洛夫	P. N. Pospelov	1898	1916	中央委員會書記
卡恩貝辛	Ia. E. Kalnberzin	1893	1917	拉脫維亞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基里連科	A. P. Kirilenko	1906	1931	斯維得羅夫斯克州第一書記
馬祖洛夫	K. T. Mazurov	1914	1940	白俄羅斯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謝瓦納茲	V. P. Mzhavanadze	1902	1927	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柯錫金	A. N. Kosygin	1904	1927	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
波烏金	M. G. Pervukhin	1904	1919	國家對外經濟關係委員會主席
科洛臣科	D. S. Korotchenko	1894	1918	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

資料來源：真理報(Pravda)，1957年11月3日，第2版。轉引自：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p. 220-221.

赫魯雪夫在其掌權期間，不斷推動各種改革；⁶⁵藉由強化制度約束以維持統

⁶⁴ 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 233。

⁶⁵ 在經濟上，將中央部會的經濟管理權力大幅下放到地方的國民經濟委員會，賦予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一定的自主權，但這些舉措並未產生刺激經濟成長的效果；1962 年後開始強調利潤、工資、獎金等手段。在政治上，1956 年蘇共二十大時赫魯雪夫除了批判史達林外，並倡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socialist legality)；1959 年的蘇共廿一大上，赫魯雪夫倡議修憲以適應政治與經濟生活的變化；1961 年的蘇共廿二大赫魯雪夫聲稱新的憲法已開始起草；1962 年最高蘇維

治效能的作法，既是「發達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須，更是放棄史達林的恐怖統治方式後的不得不然。⁶⁶1961年10月17日至30日的蘇共第廿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還規定每屆各級黨大會領導機構選舉時，其幹部至少要更換三分之一，連選以三次為限，否則需得票四分之三使得繼續連任。⁶⁷但此一例外規定無異於為最高領導人留下後路，顯示赫魯雪夫仍有意維持領導人的「終身制」。⁶⁸當時也有學者認為，在史達林以後的蘇聯體制，如果任何領導人沒有同時掌握「黨政核心」，就會越來越難以保留其最高權位。⁶⁹

然而，若非馬林科夫等人在史達林時期的斑斑劣跡，赫魯雪夫未必能將馬林科夫等人鬥倒；而赫魯雪夫將其同儕鬥倒之後，形成的權力集中，卻讓新的政治菁英感受到壓迫。倘若赫魯雪夫能夠放棄領導職務終身制，也許他能避開被推翻的命運；但其戀棧權力的結果，加上「後史達林」的較為寬鬆的政治氣氛，反而促成了「宮廷政變」。⁷⁰

在宮廷政變推翻赫魯雪夫之後，史達林與赫魯雪夫兩人的教訓，使政治菁英學習到職務分配的剛性要求的必要性，導致之後蘇聯二元領導體制的正式登場。但在這個轉折過程中，赫魯雪夫的「幹部年輕化」政策，隨著其個人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髒水一起被倒掉了！

埃通過赫魯雪夫的建議，成立「憲法委員會」（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以推動新憲法，並任命赫魯雪夫為主席。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186，187。Donald V. Schwartz ed.,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Vol. 5, The Brezhnev Years 1964-1981*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 pp. 268-269. Ung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pp. 110-111.

⁶⁶ Robert B. Ahdieh, *Russia'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1985-1996*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6. Robert Sharlet, *Soviet Constitutional Crisis – From De-Stalinization to Disintegr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 Inc, 1992), p. 63.

⁶⁷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143。採納此一強制性幹部年輕化措施的理由包括四點，其一是使領導班子保持活力，其次是避免個人迷信、維持集體領導，其三是根除拉幫結派，其四是幹部數量已增加，有此一條件。徐隆彬，**赫魯曉夫執政史**，頁387。

⁶⁸ 蘇聯的幹部制度是，在俄共（布）中央註冊的幹部為俄共（布）中央「主管幹部」，在省委註冊的人為省委「主管幹部」，以此類推。各級「主管幹部」職務的設置和任命，需經上級的批准。各級主管幹部一般不受黨員和人民監督、或者也無法監督；久而久之，幹部任命制又發展成為幹部任職終身制。對赫魯雪夫有意維持終身制的批評，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112，144，235。

⁶⁹ 張佑之，**蘇聯領導人的權力轉移**（台北：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論文，1974年6月），頁106。

⁷⁰ 推翻赫魯雪夫的「宮廷政變」是依照集體領導的制度安排所進行；此一制度安排使政治菁英群體對於領導人不滿時，可以按照遊戲規則撤換總書記；參閱多勃雷寧，**信賴**，頁716。

第二節 二元領導的實踐

史達林死後，後強人權力結構形成，蘇聯的新領導集體也達成紳士的協定（“gentlemen’s agreement”），希望以此達成領導人之間的團結。⁷¹然而經過幾年權力鬥爭，赫魯雪夫再次兼任黨書記與總理兩大職務。赫魯雪夫下台之後，權力過於集中帶來的問題讓政治菁英更加警惕，於是布里茲涅夫上台後的新領導層，就進一步對高層職務分配進行了限制。

布里茲涅夫時期的蘇聯進一步強化了集體領導，但由於犧牲了政治改革，此種領導體制是不成熟的。領導職務終身制死灰復燃，使蘇聯體制走了一條彎路；總書記兼任最高元首、行政部門另有其人領導的「二元領導體制」是穩定下來了，但「老而不死」的最高領導人，使體制僵化，最終帶來戈巴契夫時期的政治危機。

一、布里茲涅夫與典型二元領導

布里茲涅夫（Leonid Ilich Brezhnev, 1906-1982）在 1940 年代後期即開始受赫魯雪夫提拔，1960 年 5 月至 1963 年 6 月，即被赫魯雪夫安排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儼然成為赫魯雪夫的接班人。⁷² 1964 年赫魯雪夫下臺之後，布里茲涅夫被推舉為蘇共第一書記。

使布里茲涅夫上臺的是一場宮廷政變。赫魯雪夫晚年權力集於一身的情況，並未能使其權位不受挑戰；相反的，由於赫魯雪夫清除了黨內反對力量、並擔任黨政兩個實權職務，黨內再無異議聲音，因此赫魯雪夫更容易率性而為，這就使

⁷¹ Philip G. Roeder, *Red Sunset –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9-104.

⁷² 1946 年赫魯雪夫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時，布里茲涅夫即在其下擔任州委書記；1950 年赫魯雪夫成為中央書記處的書記時，也是他提名布里茲涅夫成為摩爾多瓦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提名布里茲涅夫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似乎有意讓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布里茲涅夫擔任黨內的「第二把手」，但又似乎對其能力有所保留。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49，92，93。

赫魯雪夫在施政上出現種種問題。同時，赫魯雪夫的改革訴求，一方面使權力進一步向赫魯雪夫集中，同時又得罪了大量的官僚群體。從 1920 年代開始，蘇聯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地方官僚的扈從體制，以及相應的地方政策自主權，以及人事上具有裙帶關係的官僚群體。赫魯雪夫的改革擾動了此一地方官僚階層，引起了地方官僚階層的很大反彈。⁷³這就使宮廷政變有了「群眾」基礎。

1964 年 10 月 14 日召開的中央全會，由布里茲涅夫主持，他並在此次會上被推舉為第一書記。⁷⁴在此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為保障集體領導的繼續存在，並通過「關於主席團內部發生的問題和在蘇共中央恢復列寧主義集體領導原則的措施的決議」，強調今後不容許一個人兼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⁷⁵赫魯雪夫的先例，使蘇共統治菁英理解到就算職務集中、實行單一領導，且任命了大量派系成員擔任重要職務，但只要違反了官僚群體的利益，仍會被趕下台。⁷⁶在這種共識下，當時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委員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不希望出現單一領導，加上也沒有人有此實力，後來再加上布里茲涅夫亦希望維持穩定，「不像其前任一般使用權力」，因此蘇聯「二元領導體制」得以制度化。⁷⁷而保存統治菁英內部權力平衡的努力，又變相強化了領導職務終身制。⁷⁸

布里茲涅夫上臺初期，作為第一書記的布里茲涅夫負責共產集團內部外交，

⁷³ 之後布里茲涅夫上臺乃採取「幹部穩定」(stability of cadres)政策，所造成的老人政治對蘇聯具有很深的負面影響。詳細的分析，參閱 Graeme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11.

⁷⁴ 據一些研究指出，政變的主要策劃者是謝列平和蘇斯洛夫，尤其是謝列平 (A. N. Shelepin)；擔任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伊格納托夫和國安會 (KGB) 主席謝米恰斯尼則負責組織，布里茲涅夫則只是旁觀者。但也有研究認為是謝列平、布里茲涅夫與包戈尼合謀推動此次宮廷政變；參閱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 (第四分冊)，頁 7。各派系接受布里茲涅夫，似乎是因為他比較平庸；而推動這場政變的謝列平更只是把布里茲涅夫當成一個過渡人物，準備在未來取而代之；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92, 93；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 (第四分冊)，頁 24。不過，布里茲涅夫在 1962 年 12 月的蘇共主席團成員名單中，排名第八位，之前七位包括赫魯雪夫、柯茲洛夫、蘇斯洛夫、庫斯年、什維爾尼克、基里連科，以及包戈尼；在布里茲涅夫之後還有四位主席團成員，其中包括米高揚與柯錫金；成員名單，參閱 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pp. 230-231.

⁷⁵ 畢英賢，*蘇聯*，頁 197。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 (第四分冊)，頁 18, 19。

⁷⁶ Archie Brown, "The Power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SU," p. 152.

⁷⁷ 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p. 256。趙春山，*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頁 78, 79。赫魯雪夫與布里茲涅夫使用權力形態的差異，參見 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71.

⁷⁸ Archie Brown, "The Power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SU," p. 150.

而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A. N. Kosygin, 1904-1981）負責經濟與對西方的外交；兩人在真理報上照片並列，在領導層布里茲涅夫並未被承認為領袖。⁷⁹ 1965年12月9日包戈尼（N. V. Podgorniy, 波德戈爾尼, 1903-1983）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後，與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形成「三頭馬車」式的集體領導。意識形態則交由蘇斯洛夫（M. A. Suslov, 1902~1982）主導，另外再加上謝列平，組成當時的領導集體。⁸⁰ 當時柯錫金在經濟上的權限非常大，並醞釀、推動了以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和自我補償為內容的經濟改革。⁸¹

為了維護集體領導，此一領導集體達成了分享權力的協議，並採取步驟使權力集中的難度增加。這些措施被歸納為四點，除了前述的黨書記不得兼任總理，並要求減少政治局、書記處與部長會議主席團之間的兼職，在最高領導人之間要形成制衡，並且設法不讓黨書記或其他領導人有機會產生對下層政治菁英的庇護關係。前三點在史達林 1953 年死亡後就已提出，但未能堅持；此次在 1965 年的精英妥協，則進一步強化了集體領導的規則。⁸²

1966 年 3 月蘇共第廿三次大會召開，4 月 8 日通過了黨章修正案，其中有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要求各共和國黨員大會至少每四年召開一次；也重新釐清中央

⁷⁹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44。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01，102。

⁸⁰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42，147。Roeder, *Red Sunset*, p. 104. 雖有學者認為布里茲涅夫全面掌權是起自 1970 年代初，但也有學者認為是自 1970 年代中期；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02，121；關素卿，*蘇俄黨政演變之評析（下）*（台北：黎明文化，1983 年），頁 327。此次會議上，拆解了黨和國家監察委員會，使部長會議副主席兼黨和國家監察委員會主席的年輕的謝列平的權力基礎被大幅削弱，但其派系成員包括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第一書記，因此布里茲涅夫的權力鬥爭耗時甚久，雖然 1967 年即將其主要派系成員排擠出重要職務，但直到 1975 年布里茲涅夫才將謝列平排除出政治局；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四分冊），頁 25-30。而包戈尼成為名望最高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卻犧牲了實權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位；不過在政治局與部長會議中也頗多其派系成員，因此鬥爭歷時良久，直至 1977 年包戈尼下臺為止；參閱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四分冊），頁 295-303。至於布里茲涅夫與柯錫金的權力角逐，則一直延續至 1980 年，參閱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四分冊），頁 312-317。

⁸¹ 布里茲涅夫上臺後，就陸續廢止了許多赫魯雪夫的改革措施；1964 年 11 月就廢除了當時黨組織中的工業黨和農業黨區分，1965 年 9 月取消了地區經濟委員會，重建政府部門系統，恢復「條條領導」；種種措施使西方學者稱之為「新史達林主義」。因此雖然 1965 至 1967 年間有改革呼聲，但從 1968 年開始此一改革即遭到黨內保守派基於意識形態和自身權力要求的強烈反對，於是改革逐漸難以為繼。參閱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25；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97，98；資中筠主編，*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啓示錄（下卷）*，頁 74-75。

⁸² Roeder, *Red Sunset*, p. 105.

組織的關係，即「政治局」⁸³在中央委員會休會之際指導黨的工作，書記處指導日常工作；「第一書記」則重新修訂為「總書記」，總書記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但本次大會取消了幹部更換標準規定，促成了日後的領導人終身制。⁸⁴

表 4-6 1966 年 3 月的蘇共政治局成員

成員	英文名	生年	入黨年	職務
布里茲涅夫	L. I. Brezhnev	1906	1931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基里連科	A. P. Kirilenko	1906	1931	中央委員會書記
謝列平	A. N. Shelepin	1918	1940	中央委員會書記
蘇斯洛夫	M. A. Suslov	1902	1921	中央委員會書記
貝爾謝	A. Ia. Pelshe	1899	1915	黨監察委員會主席
謝勒斯特	P. E. Shelest	1908	1928	烏克蘭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柯錫金	A. N. Kosygin	1904	1927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包戈尼	N. V. Podgorny	1903	1940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馬祖洛夫	K. T. Mazurov	1914	1940	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波里揚斯基	D. S. Poliansky	1917	1939	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弗羅諾夫	G. I. Voronov	1910	1931	RSFSR 部長會議主席
候補成員				
吉米契夫	P. N. Demichev	1918	1939	中央委員會書記
烏斯季諾夫	D. F. Ustinov	1908	1927	中央委員會書記
庫那耶夫	D. A. Kunaev	1912	1939	哈薩克斯坦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馬謝洛夫	P. M. Masherov	1918	1943	白俄羅斯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謝瓦納茲	V. P. Mzhavanadze	1902	1927	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拉什多夫	Sh. R. Rashidov	1917	1939	烏茲別克斯坦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格里辛	V. V. Grishin	1914	1939	全聯盟工會委員會主席
謝爾比茨基	V. V. Shcherbitsky	1918	1941	烏克蘭部長會議主席

資料來源：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p. 239-240. 1961 至 1976 年之間的人事更替，可另參閱 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Toward a Theory of Soviet Leadership Maintenance," in Paul Cocks, Robert V. Daniels and Nancy Whittier Heer ed., *The Dynamics of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62-66.

1969 年末至 1970 年初，布里茲涅夫的地位顯著突出，柯錫金在外交上的重要性喪失，布里茲涅夫收回了對西方的外交權；蘇聯各處也開始高掛布里茲涅夫的人像，其權力地位已明顯高於其他領導人。⁸⁵

⁸³ 1919 年成立的「政治局」，在 1952 年才被史達林改為「主席團」（presidium）。

⁸⁴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42，147。Schwartz,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Vol. 5*, pp. 71-73, 291. 由於權力向中央書記處集中，於是到布里茲涅夫晚期，中央書記處下轄二十一個部之多；各部名稱可參閱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61 圖。布里茲涅夫曾希望在此次會議上以蘇聯建國五十年為由推動新憲法，但由於權力不足、反對者眾，也遭到失敗，參閱 Schwartz,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Vol. 5*, p. 269.

⁸⁵ 在這幾年期間，包括前述謝列平、謝米恰斯尼等許多蘇共領導人已被排擠出政治局，包括後

此時蘇聯領導體制的弊端已經逐漸積累。雖然從 1968 年到 1972 年密集出臺了許多加強各級「蘇維埃」權力的法令，以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⁸⁶且在 1971 年的蘇共廿四大，還增加了中央委員會每五年至少應召開一次黨大會的規定，⁸⁷但此次大會前後蘇聯已經停止了改革，甚至諱言「改革」。⁸⁸於是幹部制度中的「任命制」與「終身制」的問題，都無法加以扭轉；⁸⁹甚至在布里茲涅夫 1974、1975 年連續兩次中風、工作能力日益衰頹的情況下，也沒有改變、撤換蘇聯領導人的機制。⁹⁰

1977 年 5 月 24 日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布里茲涅夫將包戈尼逐出政治局，6 月 16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包戈尼辭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職，會議選舉出布里茲涅夫為新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從而正式結束了十二年的三頭馬車的集體領導形式。自 1964 年 10 月以來，第一次黨的領導人也佔有兩個國家職務中的其中一個。布里茲涅夫由此可以以正式的、官方的職務，來領導國家。⁹¹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在早期雖被視為是值得尊敬的國家象徵，但擁有此職務者都非政治權力競爭者，例如加里寧、什維爾尼克、伏羅希洛夫；但自 1960 年布里茲涅夫被任命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以來，其後的米高揚、包戈尼都是

來也擔任總書記的契爾年科等則獲得提拔。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42；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99-102。

⁸⁶ 包括 1968 年的「關於村鎮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基本權利和義務」，1971 年的「關於市和市轄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關於區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權利和義務」，1972 年的「蘇維埃的代表地位法」；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20-121。

⁸⁷ Schwartz,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Vol. 5*, pp. 189-190.

⁸⁸ 布里茲涅夫第一次被提出「發達社會主義」是在 1967 年的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上，在「發達社會主義」的理論下，體制只能是「完善」和「發展」；此後布里茲涅夫領導下的蘇聯就離「改革」愈來愈遠。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97，187。

⁸⁹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238。

⁹⁰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06，131。

⁹¹ 布里茲涅夫以黨的領導人兼任元首可以彰顯黨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出國時的需要為由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後者有一實例，1973 年布里茲涅夫訪問西德，波昂不願意給予布里茲涅夫似乎應得的國家元首禮炮待遇；參見 Brown, "The Power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SU," p. 142. 另參閱陸南泉、姜長斌主編，*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92，131；畢英賢，*蘇聯*，頁 198；關素卿，*蘇俄黨政演變之評析*（下），頁 328-330。

活躍的權力競逐者，顯示出在國家逐漸步入正軌之後，國家元首的地位上升的現象，同時這也被視為是最高蘇維埃做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現。

⁹²而蘇聯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接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並身兼「國防委員會主席」，三職合一，更象徵蘇聯步入了典型二元領導體制的階段。⁹³

同時，布里茲涅夫也推動制定了新憲法，聲稱可以反應自 1936 年憲法制訂以來的社會經濟變化；⁹⁴不過雖然此次憲法條文與 1936 年相比頗有不同，但在「最高蘇維埃」與部長會議的關係上則並無多少變化。⁹⁵

在這之後布里茲涅夫雖然權力獨大，但並未爭取「部長會議主席」一職。原任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在 1977 年夏天開始由於健康因素，職務經常由部長會議主席團副主席代理；但由於副總理也多年紀甚大，在 1977 上任的馬謝洛夫 (P. M. Masherov) 僅任一年，隔年即由於健康因素將職務轉交吉洪諾夫 (N. A. Tikhonov, 1905.5.14~)；到 1980 年 10 月 22 日吉洪諾夫替代柯錫金為總理，同時撤換了兩位年過七十的副總理。⁹⁶但就是在此一布里茲涅夫權勢最大的時候，柯錫金也仍保有其自主空間，⁹⁷二元領導體制仍得到維持。

⁹² 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p. 371. John S. Jr. Reshetar, *The Soviet Polity –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U.S.S.R.*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71), p. 211. Ung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p. 100. 邢廣程, *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 (第五分冊), 頁 661。

⁹³ Hazan, *From Brezhnev to Gorbachev*, pp. 5-6. 由於資料所限，僅確知至遲於 1976 年 5 月 8 日，布里茲涅夫亦已擔任蘇聯國防會議主席，但一般而言蘇聯總書記即兼任此一職務；尹慶耀, *蘇維埃帝國的消亡*, 頁 43。但布里茲涅夫並未藉由其最高軍事領導人的身份增加其政治利益；參閱多勃雷寧, *信賴*, 頁 699。

⁹⁴ 布里茲涅夫推動新憲的兩個理由，其一是由於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廣泛以及實施科學技術的進步；其二是由於勞工階級、農民、知識份子都已在社會主義的環境中，形成了社會、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同質性；參閱“Plenum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24 May 1977,” Schwartz,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Vol. 5*, p. 268.

⁹⁵ 當年十月召開中央委員會時，通過了新的蘇聯憲法草案，並擴大、提高了蘇共在蘇聯政治中的「核心」地位，甚至賦予政治局立法權。同時將「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寫入新憲法，反映了教條主義的思想路線；參閱 Schwartz,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Vol. 5*, p. 270. 新舊憲法之比較，可參閱尹慶耀, *蘇聯新憲法之剖析* (台北：世界反共聯盟中華民國分會，民 67 年)；兩部憲法的條文對照，可參閱 F. J. M. Feldbrugge,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USSR and the Union Republics: Analysis, Texts, Reports*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Sijthoff & Noordhoff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1979), pp. 70-171.

⁹⁶ 尹慶耀, *蘇維埃帝國的消亡*, 頁 119。1978 年 1 月時的蘇共領導人名單、職務，可參見 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pp. 270-271. 也有認為布里茲涅夫爭取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但受到權力制衡機制的壓力而失敗，參閱 Roeder, *Red Sunset*, pp. 109-110.

⁹⁷ 畢英賢, *蘇聯*, 頁 220。

表 4-7 布里茲涅夫晚期（1980 年初）的蘇聯領導人

領導人	派系	主要領導人	
布里茲涅夫(L. I. Brezhnev, 1906~82)	柯錫金派	索洛敏澤夫(M. G. Solomentsev, 政治局候補委員, 1913~)	
		卡皮特諾夫(Ivan V. Kapitonov, 黨中央書記)	
		吉米契夫(P. N. Demichev, 政治局候補委員, 1918~)	
		柯錫金(A. N. Kosygin, 部長會議主席, 1904~)	
	外務實務派	烏斯季諾夫(D. F. Ustinov, 國防部長, 1908.10.30~)	
		葛羅米科(A. A. Gromiko, 外交部長, 1909.7.18~)	
		安德洛波夫(Yu. V. Andropov, 國家安全會議主席, 1914.6.15~)	
	意識型態（思想理論）派	貝爾謝(A. Ya. Pel'she, 黨檢查委員會主席, 1899.2.7~)	
		波諾馬廖夫(B. N. Ponomarev, 政治局候補委員, 1905~)	
		蘇斯洛夫(M. A. Suslov, 政治局委員, 1902.11.2~)	
	布里茲涅夫派	哈薩克派	庫納耶夫(D. A. Kunayav, 哈薩克黨第一書記, 1912.1.12~)
		摩爾達維亞派	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 政治局委員, 1911.9.24~)
	德聶伯派	吉洪諾夫(N. A. Tikhonov, 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1905.5.14~)	
		謝爾比茨基(V. V. Shcherbitsky, 烏克蘭黨第一書記, 1918.2.17~)	
基里連科(A. P. Kirilenko, 政治局委員, 1906.9.8~)			
內務實務派	馬謝洛夫(P. M. Masherov, 政治局候補委員)		
	羅曼諾夫(G. V. Romanov, 列寧格勒省黨第一書記, 1923.2.7~)		
	格里辛(V. V. Grishin, 莫斯科市黨第一書記, 1914.9.24~)		

資料來源：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臺北：五南，民 83），頁 120。

布里茲涅夫時期，為維持各部門和領導幹部的「穩定」，形成了某種「社會契約」與「布里茲涅夫風氣」，醞釀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地方主義，並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領導幹部終身制。⁹⁸到布里茲涅夫晚年，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平均年齡已達七十多歲，政治局已經很難對議題進行討論。布里茲涅夫本人由於疾病纏身，雖然仍擔任總書記、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武裝部隊總司令等職務，但實際上這些職能多半都由布里茲涅夫「身邊的人」去履行。⁹⁹領導人的普遍衰老，為其後的政治震盪埋下了火藥。

中國大陸學者指出，從布里茲涅夫執政的教訓來看，「對黨的最高領導人規定嚴格的任期制也是必要的」，若蘇共黨章規定領導幹部任期不能超過兩屆，布

⁹⁸ 布里茲涅夫晚期的領導人職務與生年，可參閱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20。

⁹⁹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04-107。布里茲涅夫還服用大量安眠藥，乃至於興奮劑，以致於「周圍的人都能看到總書記這種昏昏欲睡的半麻木狀態」；參閱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31。

里茲涅夫晚期的領導人普遍老齡化、體制僵化和國家陷入全面停滯的可悲局面或許可以避免。¹⁰⁰然而，歷史與此背道而馳，1982年11月10日布里茲涅夫去世之後，緊接著是安德洛波夫（Yu. V. Andropov, 1914.6.15~1984.2.9）、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 1911.9.24~1985.3.10）的「短暫領導」。¹⁰¹這一階段的老人政治嚴重削弱了蘇聯政權的合法性，使其後的改革激進化，終至無法收拾。

表 4-8 蘇聯領導層的老化

年份	1939 年	1952 年	1964 年	1980 年
時代背景	史達林中期	史達林晚期	赫魯雪夫後期	布里茲涅夫晚期
中央政治局委員	50.3	55.4	61.0	70.1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46.0	50.9	52.8	62.5
中央書記處書記	46.0	52.0	54.1	67.0
部長會議主席團	42.2	54.9	55.1	68.1

資料見：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83, 89.

二、短暫領導的二位總書記

布里茲涅夫晚年，可能在其身後爭奪總書記一職的主要有兩人，即安德洛波夫與契爾年科。¹⁰²契爾年科是布里茲涅夫身前最貼身的人物，布里茲涅夫也比較支持契爾年科；但安德洛波夫是僅次於布里茲涅夫的黨內第二號人物，且長期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又曾擔任蘇聯國家安全會議（KGB）主席的職務，因此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D. F. Ustinov, 1908~1984）、外交部長葛羅米科（Andrei A. Gromyko, 1909.7.18~），以及列寧格勒省黨第一書記羅曼諾夫（G. V. Romanov, 1923.2.7~）、烏克蘭黨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V. V. Shcherbitsky, 1918.2~）以及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戈爾巴喬夫）等則支持安德洛波夫。1982年5月蘇

¹⁰⁰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13。

¹⁰¹ 或稱為「過渡領導」。參閱趙春山，*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頁 10。

¹⁰² 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員的背景，參閱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四分冊），頁 335，336。

共中央全會上安德洛波夫被選為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奠定其接班人的地位。

但 1982 年 11 月 10 日布里茲涅夫去世當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契爾年科與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N. A. Tikhonov, 1905.5.14~）還試圖翻案，尋求讓契爾年科成為總書記，但遭到烏斯季諾夫與葛羅米科的反對；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員也表態支持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科因此失敗了。但安德洛波夫上臺後，仍讓契爾年科成為僅次於他的第二把手，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12 日的中央非常全會上，安德洛波夫接任了布里茲涅夫的總書記一職，但由於契爾年科派系的干擾，並未能立即接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¹⁰³

到 1983 年 6 月中央全會前後，安德洛波夫已進行數次人事異動，政治地位提高，於是在契爾年科的妥協中，兼任了蘇聯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以及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國防會議主席。¹⁰⁴同時，安德洛波夫原本即以傾向改革、重視知識份子著稱，¹⁰⁵在上臺之後也確實展開了一些改革，例如處理布里茲涅夫的女婿切爾巴諾夫和內務部長謝洛科夫等人的腐敗案件。¹⁰⁶

安德洛波夫上臺後也積極培養接班人，提拔了數位年輕人進入政治局。已經是政治局委員的戈巴契夫與安德洛波夫是同鄉，安德洛波夫執政的一年期間，戈巴契夫對決策的影響力日益上升，開始越來越多的參與解決廣泛的經濟問題、蘇共的組織工作和人事工作問題，乃至於逐漸排擠黨內第二號人物契爾年科。¹⁰⁷

¹⁰³ 安德洛波夫是在 1967 年 3 月擔任國安會主席職務。參閱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39；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00。布里茲涅夫晚期，規定各部門發送黨內領導人的資料都需先交給契爾年科主持的總務部，再由總務部官員決定這些資料的命運，可見契爾年科的權力之一斑；參閱資中筠主編，**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啓示錄（下卷）**，頁 77。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四分冊）**，頁 341-351。畢英賢，**蘇聯**，頁 198。

¹⁰⁴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四分冊）**，頁 352，353。

¹⁰⁵ 1964 年 12 月安德洛波夫即曾向蘇共領導層提出一個比赫魯雪夫執政時期更徹底的改革綱領。資中筠主編，**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啓示錄（下卷）**，頁 70-71。

¹⁰⁶ 切爾巴諾夫曾任內務部副部長。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00，110。

¹⁰⁷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四分冊）**，頁 356。在安德洛波夫當選為蘇共總書記時，戈巴契夫似乎非常高興，聲稱他和「安德洛波夫是老朋友，兩家關係也很好」，「我們的觀點一致」，參閱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39，40。但博爾金自己也承認他並不確知戈巴契夫與安德洛波夫的關係是否真如戈巴契夫對其所稱的友好，且安德洛波夫的親信幕僚也似乎並不如此認為；另一方面，戈巴契夫擔任總書記後，也極力貶低安德洛波夫的作用；見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

1983 年 12 月中央全會召開之前，由於安德洛波夫的健康狀況難以進行發言，於是寫了一封致全會的信，讓戈巴契夫在會上做簡短的發言，這似乎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暗示，顯示安德洛波夫有意將總書記的權力交給戈巴契夫。戈巴契夫為此做了準備，但其發言使擁護他和反對他的人都增加了；很多人認為戈巴契夫是一位好出風頭的人，缺乏工作經驗和生活知識，雖然另一些人全心全意地支持戈巴契夫。¹⁰⁸

1984 年 2 月 9 日安德洛波夫去世，當時的契爾年科也已經是個「體弱多病、言語遲緩、呼吸困難的人」，支持他擔任總書記是一項困難的決定；但當時的權威人物、長期主管國防工業的烏斯季諾夫仍決定支持契爾年科；同時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Nikolai Tikhonov）、外交部長葛羅米科等也支持契爾年科。此外，安德洛波夫的改革已經引起一些蘇聯政治菁英的害怕，契爾年科則能消弭這種對改革的恐懼，這都促成了契爾年科成為總書記。雖然如此，考慮到契爾年科年齡較大，烏斯季諾夫與契爾年科也安排了由戈巴契夫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但由於吉洪諾夫等的反對，此一安排經過一段時間的延宕才被落實，政治局內反對戈巴契夫的力量確實相當可觀。¹⁰⁹

在這樣的形勢下，2 月 13 日蘇共中央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確認契爾年科為蘇共總書記。不久之後契爾年科又擔任了安德洛波夫也擔任的國防會議主席，到 4 月中旬的最高蘇維埃第 11 屆 1 次會議上，就又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不過戈巴契夫也在這次會議上成為蘇維埃聯盟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顯示其為黨內第二號人物。¹¹⁰契爾年科成為第三位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職的蘇共總書記，而當時戈巴契夫聲稱總書記兼任此一職務，在國內的象徵地位和國

浮錄，頁 48，49。另外，也有人認為積極有為的安德洛波夫並不喜歡戈巴契夫，契爾年科才是戈巴契夫的權力庇護者，參閱佩特羅夫，**戈爾巴喬夫現象**，頁 34-35。

¹⁰⁸ 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46，47。

¹⁰⁹ 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49-55，66。權力爭奪的細節，可參閱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四分冊），頁 356，357。

¹¹⁰ 多勃雷寧，**信賴**，頁 625。畢英賢，**蘇聯**，頁 223。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四分冊），頁 351，359。

際事務的處理上是「必要的」(essential)。¹¹¹

在契爾年科初上任時，蘇聯的中央委員和國家領導人分成兩個陣營，守舊者支持契爾年科，但一些「有工作能力和慣於看風使舵的幹部則向戈巴契夫和其他相對年輕的領導靠攏」，幹部隊伍的分化使蘇共政治的不穩定性隨之增加。¹¹²在這樣的氛圍下，起初戈巴契夫由於感覺不到在安德洛波夫時代來自總書記的信任感，加上與部長會議的領導人也缺乏相互理解，因此感到極為孤立。但戈巴契夫在契爾年科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一事上表示支持，且在其他事務上也不斷向契爾年科示好，雙方關係乃開始和緩。契爾年科晚期已無力工作，¹¹³戈巴契夫開始經常代為主持政治局會議，於是從 1984 年夏天開始，政治局逐漸為戈巴契夫所控制。¹¹⁴

從安德洛波夫到契爾年科，都疾病纏身，因此也無力進行權力爭奪，一些政策的決策權也交由各部門的實際負責任控制，例如契爾年科上任後，由於對外交事務毫無興趣，就將外交事務全面授權給葛羅米科。¹¹⁵由於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亦即國家主席）是一個禮賓職能的位置，因此契爾年科又在 1985 年年初，將此一職位讓給葛羅米科，葛羅米科同時還續兼任外交部長一職；因此葛羅米科的權威就有了提高。¹¹⁶但當時戈巴契夫已經作為一個上升的明星，已經受到美國重視，因此負責外交的葛羅米科對戈巴契夫亦有不滿。¹¹⁷

¹¹¹ 參閱 Stephen White, "The Soviet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Soviet Power," in Rajan Menon and Daniel N. Nelson ed., *Limits to Soviet Power*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1989), p. 51.

¹¹² 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56-59。

¹¹³ 由於契爾年科身體狀況不佳，政治局會議上應由總書記提出的議程都在很大程度上由契爾年科的助手和「中央總務部部長」勃戈柳博夫確定；會議議程一般都不長，也不舉行討論；1984 年 8 月以後，契爾年科已經幾乎成了殘廢。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56-60。

¹¹⁴ 多勃雷寧，*信賴*，頁 546。

¹¹⁵ 多勃雷寧，*信賴*，頁 626。

¹¹⁶ 多勃雷寧，*信賴*，頁 641。

¹¹⁷ 多勃雷寧，*信賴*，頁 640，641。

三、戈巴契夫初期的權力平衡

1985年3月10日契爾年科去世，當時可能競逐總書記一職的有契爾年科派系的外交部長葛羅米科與莫斯科市委書記格里申(V. V. Grishin, 1914.9.24~)，但兩位都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還有就是已成為第二書記的戈巴契夫，但許多政治局委員對戈巴契夫並無好感，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擔心戈巴契夫上臺後他們將失去權力舞臺。¹¹⁸

然而，1980年代上半，柯錫金(1980)、蘇斯洛夫(1982)、布里茲涅夫(1982)、包戈尼(1983)、安德洛波夫(1984)、烏斯季諾夫(1984)、契爾年科(1985)等蘇共領導人相繼過去，造成一種希望政治局年輕化的氣氛；這就大大有利於戈巴契夫爭取總書記職務。此外，戈巴契夫還允諾葛羅米科可以繼續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職，讓戈巴契夫贏得葛羅米科的關鍵支持，在政治局以及隨後的中央委員會上，戈巴契夫終於獲得了總書記的提名與任命。¹¹⁹

¹¹⁸ 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74。相對於其他年老的政治局委員，有學者認為戈巴契夫的年輕、高學歷反映了一種新風氣的出現，代表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關於戈巴契夫的學歷、年齡相對於此前領導人的優勢，可參閱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110。但批評戈巴契夫者，則認為這些反對戈巴契夫的領導人是由於對戈巴契夫能力的懷疑，強調戈巴契夫也是順著「扈從」關係往上升遷的共產黨員，且其經歷一直是在黨政機關，並無實際的經濟工作經驗，且喜歡標新立異、不同凡響；參閱佩特羅夫，**戈爾巴喬夫現象**，頁32，43。戈巴契夫不喜歡顧問；在政治局的會議中，戈巴契夫則善於用其滔滔不絕的雄辯，使多數人避免與其發生對立，使他在政治局沒有遇到直接的或者有組織的反對，而總是接受他的決定；總喜歡佔上風的思想使他聽不進別人的意見，也難以接受「別人的」想法；這種態度使人難以與他共事；總體而言，戈巴契夫對蘇聯崩潰的主要作用，蘇聯崩潰不是由於經濟問題或者美國壓力；參閱多勃雷寧，**信賴**，頁692-697；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67。學者認為，「任命制」使被提拔的幹部往往是擁有善於讓上級歡喜的性格的人，因此「投機鑽營、見風使舵、庸碌無為」，而正是蘇聯的共黨體制的「任命制」，讓這種人能夠成為國家領導人；而當這樣的人成為國家領導人，擁有無限權力，其他領導人就對之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看著蘇聯的瓦解，戈巴契夫就是這樣的國家領導人；曾在戈巴契夫時代擔任總理的雷日科夫，更批評戈巴契夫的「改革」只是「一部背叛的歷史」；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240。根據李加契夫1993年出版的回憶錄，戈巴契夫在許多事務上專力親為，超過其所能負擔，以致於對許多事務都沒辦法想得仔細，李加契夫認為這也間接促成了蘇聯共黨政權的崩潰。見Leslie Holmes, *Post-communism –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8), p. 25。由於戈巴契夫的猶豫不決，使之常只有願望方面的正確，但卻未能採取主動的行動，因而在面對蘇聯晚期的混亂局勢，束手無策，最終導致了1991年八月的叛亂；參閱普里馬科夫，**大政治年代**，頁70。

¹¹⁹ 佩特羅夫，**戈爾巴喬夫現象**，頁38，39。另外，權力人物、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也於1984年12月20日死亡；參閱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121。學者認為，若非蘇聯形勢極為嚴重，傳統勢力絕不會讓戈巴契夫上臺，葛羅米科也不會推薦戈巴契夫；參閱資中筠主編，**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下卷），頁83。一種說法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在格里申與戈巴契夫之間投票，四比四，會議主席葛羅米科投給戈巴契夫，才讓戈巴契夫當選；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70年**（第

而在這樣的形勢下，原本從布里茲涅夫開始，蘇聯的黨國體制的權力繼承已有規矩可循，已逐漸具有妥協性、可預測性與制度化等特徵；同時蘇聯總書記不再兼任政府首腦，而是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¹²⁰形成了國家名義的最高領導人與黨的最高領導人的重合，加上負責行政的部長會議主席的「二元領導模式」；但由於契爾年科執政晚期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職讓給葛羅米科，加上戈巴契夫與葛羅米科的政治妥協，從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到契爾年科的蘇聯領導職務安排也暫時被放棄了。

表 4-9 戈巴契夫擔任總書記時的蘇聯領導人年齡

職稱	人數	年齡				平均年齡
		≥80	70~79	60~69	50~59	
政治局委員	10	1	4	3	2	67.5
政治局候補委員	6	2	3	0	1	68.5
書記處書記(非政治局委員者)	5	0	3	1	1	67.6

資料見：Graeme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5.

雖然契爾年科到戈巴契夫的權力轉移，使典型二元領導體制暫時退化為非典型二元領導體制，但從布里茲涅夫到戈巴契夫的三次權力轉移，四任蘇聯領袖，仍然都維持了「二元領導體制」的樣貌。然而，從布里茲涅夫到契爾年科的典型二元領導體制，是以「領導職務終身制」為背景，由於原任領導人一直任職至其去世，因此緊接的權力交接就必然是「一次接班」。這種「終身制」與其帶來的一次性職務全面轉移，僅從職務全面轉移來看，似乎顯得頗具制度化的意涵。然而，這種穩定的職務分配，卻產生在一灘死水般的老人政治中，因此必然難以持久。到契爾年科死後，由戈巴契夫掌政，人事的加速更替勢所必然地展開了。

1985年4月30日，戈巴契夫將國安會（KGB）主席契布里科夫由政治局候補委員提升為正式委員，將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加契夫（Yegor K. Ligachev，利加

四分冊），頁 363，365。

¹²⁰ Roeder, *Red Sunset*, p. 112. 葉自成，*俄羅斯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1997年），頁 76。

喬夫，時年 64 歲）與雷日科夫（N. I. Ryzhkov，時年 55 歲）直接由中央委員提升為政治局委員。另外將接替烏斯季諾夫的擔任國防部長的索科洛夫（S. L. Sokolov）和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塔里津（N. V. Talyzin）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¹²¹

1985 年 7 月的中央委員會，葛羅米科被解除了外交部長的職務，但由於其協助戈巴契夫當選總書記，因此並未退休，而是專任形式上國家最高職位、但實質上僅是禮賓性質的最高蘇維埃主席一職。¹²²

同一次中央委員會上，戈巴契夫提攜黨中央建設部部長葉爾欽（Boris Yeltsin）為主管建設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列寧格勒黨委第一書記札伊可夫（L. N. Zaikov，或譯「列夫·沙可夫」，時年 62 歲）為主管國防工業的中央書記，至此中央書記處中有六人以上為戈巴契夫所提拔，剩下的書記則都是七十多歲的老人，政治生涯不久皆告結束。¹²³戈巴契夫並藉由重新任命從未接觸過外交事務的當時格魯吉亞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書記謝瓦納茲為外交部長，掌握了外交的實權，並在不久之後就排除了其他政治局委員對外交事務的參與。¹²⁴戈巴契夫並將蘇共的黨的外交系統重新拉回外交決策的過程中，以稀釋葛羅米科在外交事務上的大權。¹²⁵

1985 年 9 月 27 日，年紀比布里茲涅夫還要年長的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去職，由雷日科夫接任；10 月 15 日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巴依巴科夫（N. K. Baibakov）去職，由塔里津接任；12 月 24 日，自 1971 年起即擔任莫斯科市黨委第一書記的格里辛去職，由葉爾欽接替其職位。從 1985 年年中，

¹²¹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19，121。

¹²² 多勃雷寧，*信賴*，頁 647。1985 年 7 月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戈巴契夫發表演說，聲稱雖然 1977 年以來總書記即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職，但現在總書記應該專心於政黨與政府的組織工作，已不再需要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了。於是蘇聯領導層的權力分配似乎回到了 1970 年代早期的樣態。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18.

¹²³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19-122。

¹²⁴ 當時謝瓦納茲（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為格魯吉亞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書記。多勃雷寧，*信賴*，頁 647-652。然而，當時謝瓦納茲在格魯吉亞正因腐敗而受到調查，這被一些學者暗示是戈巴契夫用人唯親的證據；參閱佩特羅夫，*戈爾巴喬夫現象*，頁 41，56。

¹²⁵ 多勃雷寧，*信賴*，頁 647。

到同年年底，就有五位部長會議副主席去職。¹²⁶

當時蘇聯的整體社會經濟形勢已經非常嚴峻，官僚機構膨脹、效率低下，¹²⁷1980 年代初的部長會議已包括 64 個部和 20 多個國家委員會及直屬機構，正副部長多達八百餘人。¹²⁸加上布里茲涅夫上臺之後，幹部年輕化政策即被「領導人終身制」取代，連續三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死亡，加劇了蘇聯的合法性危機，使改革的社會氛圍頗為強烈。戈巴契夫的總統辦公室主任博爾金就寫道：「我常想，一個人難道在死神就要降臨時也不能節制自己的野心，不能為國家的寧靜和繁榮放棄力不從心的擔子嗎？……（契爾年科擔任總書記）是一個令人沮喪的訊號，人們不敢相信，這個同樣體弱多病、言語遲鈍、呼吸困難的人，會成為蘇聯共產黨和一個大國的新領袖」。¹²⁹在這樣的形勢下，戈巴契夫的上臺乃不可避免地激發了社會上的轉變願望；而他為了進一步掌握權力，乃藉由親近民眾、訴求一般人民支持，以獲得一種獨立於黨政官僚階層的權力基礎；並採取了與赫魯雪夫類似的手段，運用「公開性」等口號進行黨內鬥爭，並把與美國舉行最高級別的領導人會晤，當成加強個人威信的工具。¹³⁰

雖然戈巴契夫改革方案的主要思想，在 1984 年秋天即開始醞釀，並由戈巴契夫的幕僚開始起草，¹³¹但是戈巴契夫或蘇聯其他領導人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新思維藍圖，對於經濟應該如何改革，也沒有足夠的知識。¹³²而在權力鬥爭的過程中，

¹²⁶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19-122。

¹²⁷ 在戈巴契夫時期擔任總統辦公廳主任的博爾金指出，由於「人們看到的是一片混亂和無人經營的局面，因此不可能還有工作熱情」，但是當權者無所作為，布里茲涅夫等領導人「萎靡不振，一事無成」，在大型黨組織和社會階層中「道德水準普遍下降，吃喝之風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26。

¹²⁸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20。

¹²⁹ 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50。

¹³⁰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p. 18, 19, 26, 45. 佩特羅夫，**戈爾巴喬夫現象**，頁 38。戈巴契夫同時也希望藉此緩和當時美蘇的對立氣氛，將資源轉為民生，參閱多勃雷寧，**信賴**，頁 546。蘇共二十六次時，政治領導層已經過於年老，絕大多數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似乎「活不到下一次代表大會」，思考蘇聯前途的知識份子因此開始尋找可能的權力接班人；許多知識份子開始關注戈巴契夫，戈巴契夫的上臺也激發了社會上的轉變願望；參閱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92，93。

¹³¹ 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62。

¹³² 蘇聯的國內學者，例如科學院院士，沒有經濟管理的經驗，至於國外經濟學家或企業家的建議，則也是極為片段破碎。這種知識的有限性，加上經濟問題趨於嚴重，使得戈巴契夫「在實際

戈巴契夫雖然順利的以「重建」為名，「大量撤換幹部，使其年輕化、技術化、效率化」，以「健全黨政組織，恢復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與權威，並提高經濟效益」。¹³³但戈巴契夫的種種作為，也引起政治局內其他領導人的異議，¹³⁴事後看來，戈巴契夫並沒有改變蘇聯個人集權的傳統，¹³⁵只是以改革為名強化其自身的權力。

在 1986 年的蘇共二十七次大會，戈巴契夫正式提出其改革方案。提出的建議包括規定領導人一般只能連任一次，少數例外也只能連任兩次；戈巴契夫也宣稱總書記應只能連任一次，並僅有十年任期。但實際上本次會議通過的民主化措施極為有限，例如黨政工作人員應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活動等。¹³⁶

在此次會議上，四成（40.7%）的中央委員是第一次被選出，是 1961 年以來最高的替換率。十四位蘇聯加盟共和國地方領導人中的五位，也在當年年底被更換。¹³⁷政治局候補委員兼蘇聯最高主席團第一副主席庫茨涅佐夫（V. V. Kuznetsov）與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波諾馬廖夫（B. N. Ponomarev, 1905~）也都去職，莫斯科市黨委第一書記葉爾欽與列寧格勒省黨委第一書記索洛維耶夫（Yu. F. Soloviyev）則被提升為候補委員。¹³⁸

但蘇共二十七次大會提出的種種措施，並未使戈巴契夫的權力獲得鞏固；到 1986 年底，戈巴契夫已經認為必須進行更多的制度改革。然而戈巴契夫的人事調整幅度實在過於激烈，從 1985 年 3 月上臺至 1987 年初，黨中央部長級幹部 21 人更迭了 70%、地方、省黨委第一書記 157 人，更換了 45%；政府部長級 105 人，更迭了 70%；駐外大使 137 人，更換了 50% 以上；政治局委員 10 人中的 5 人，

問題前越來越表現得毫無辦法，常採用衝動的、狂熱和魯莽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參閱多勃雷寧，*信賴*，頁 720，721。

¹³³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23。

¹³⁴ 但戈巴契夫總是在會議上打斷此種發言，強調這種異議與「新思維和改革精神相抵觸」；參閱多勃雷寧，*信賴*，頁 708，714-715。

¹³⁵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51。

¹³⁶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30.

¹³⁷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24.

¹³⁸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19-121。

候補委員 8 人中的 6 人，中央書記處 11 人中的 8 人是新面孔。¹³⁹競爭上崗的幹部體制改革帶來的急遽人事異動，妨礙了官僚層的利益，加上戈巴契夫的種種舉措失當，威信下降，於是在 1987 年 1 月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戈巴契夫乃遭到了公開的反對。¹⁴⁰改革仍然部分被推動，但戈巴契夫逐漸將官僚體系視為其「反對派」。¹⁴¹

總體而言，通常蘇聯總書記上臺後得先穩定原有幹部，不會安排與撤換幹部；但戈巴契夫與布里茲涅夫時期大有不同；¹⁴²其上任不久即大刀闊斧的開始進行人事更替，以擴大作為其權力基礎的穩健改革聯盟，其速度使西方的蘇聯觀察家都大吃一驚。¹⁴³雖然戈巴契夫掌權初期，權力平衡機制使其人事任命必須有所妥協，但 1987 年後，黨內制衡機制已經幾乎不能制約戈巴契夫。¹⁴⁴「改革」的不斷加速使蘇聯體制最終脫軌，走向崩潰。

第三節 走向後共的半總統制

在蘇聯歷史上，1936 年憲法規定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直被稱為國家元首，也常被稱為「總統」。戈巴契夫自 1985 年擔任總書記後，一開始缺乏實際的國家職務，但到 1988 年 10 月 1 日，也擔任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此一職務於 1989 年 5 月修憲、選舉後成為最高蘇維埃主席，但仍然只是國會的議長。

1990 年 3 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修憲案，5 月選舉戈巴契夫成為「總統」；這時戈巴契夫成了名符其實的總統。不過，僅僅一年半以後，他就在政變中失去

¹³⁹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23。當時的蘇共中央政治局人事，以及蘇共中央各部會人事，可參同書，頁 124-126。

¹⁴⁰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p. 32-38. 另外，這一次會議中，蘇共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A. N. Yakovlev）也被提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參閱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21。

¹⁴¹ 佩特羅夫，*戈爾巴喬夫現象*，頁 284。

¹⁴² 多勃雷寧，*信賴*，頁 699。

¹⁴³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14.

¹⁴⁴ Roeder, *Red Sunset*, p. 114.

了權力。首先，是他的副手、幕僚們將他軟禁；然後，是葉爾欽將他的權力收入囊中。到 1991 年 12 月 26 日，蘇聯就不復存在，戈巴契夫「無職可辭」地將前蘇聯核武器的按鈕交給了葉爾欽。

戈巴契夫掌握大權的最後三年多的時間，是一個危急愈大、愈汲汲於集中權力的螺旋；戈巴契夫在此過程中拋開了蘇共政治局、拋開了蘇共中央書記處，成為半總統制外衣下的超級總統，但仍然無力解決蘇聯面對的難題。但此最後的修憲過程，也連帶塑造了其後俄羅斯的半總統制。

一、回歸典型二元領導體制

從 1987 到 1988 年，雖然政策上屢遭挑戰，但戈巴契夫藉由更換領導人，仍使其權力獲得鞏固。¹⁴⁵但 1987 年 10 月中央全會上，葉爾欽由於其激進改革主張，其對李加契夫與官僚體制的抨擊，以及對戈巴契夫大搞個人崇拜的批評，而失去其政治局候補委員與莫斯科第一書記的職位。¹⁴⁶由此「改革派」乃不可避免底分裂了。

1988 年開始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使戈巴契夫面臨失去權力的危險：爲了清除那些不贊同他的路線的經濟工作者與黨的領導人，他「急急忙忙地開始籌畫在生產領域實行『民主化』；最初是建議選舉產生廠長和企業領導者，後來又打擊黨和政府中不服從他的經濟領導者，撤換各級管理機關的官員，結果仍無法使經濟起色」，¹⁴⁷在這種情況下推動了 1988 年的修憲，幅度達到整部憲法條文的三分之一，¹⁴⁸但社會經濟條件不穩定情況下的制度改革，卻對挽救危機的發生毫無

¹⁴⁵ 戈巴契夫以其作爲「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到 1987 年，已撤換國防部長、並逼迫大約一百名將軍、上校，以及反對戈巴契夫改革、和不贊成對美國人退讓的軍界保守的領導人退休，並使戈巴契夫得以控制高級將領。參閱多勃雷寧，*信賴*，頁 706，707。另參閱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59. 雖然如此，戈巴契夫仍然不相信軍隊，甚至「害怕軍隊」；這似乎使其在改革與施政上容易有所偏頗；參閱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409。

¹⁴⁶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61. 使戈巴契夫不願意維護葉爾欽，乃至於迫使其去職的原因也是由於戈巴契夫不樂見其他領導人過多被評論和報導；由於被廣爲報導因而失去其職務的，還有其他一些共黨領導人。參閱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357。

¹⁴⁷ 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98，99。

¹⁴⁸ Sharlet, *Soviet Constitutional Crisis*, p. 86.

幫助，於是戈巴契夫在路線上變得更加搖擺不定。

1988年6月到9月，戈巴契夫在黨代表會議與中央全會中，進一步清除了「反對派」。¹⁴⁹雖然如此，許多人認為，戈巴契夫將體制由政治局的集體領導轉變為「總統治理」的一人領導，是克服黨內高層集團以及各地保守主義的唯一道路，而此一思路的方向並非將蘇聯共產黨自直接領導國家的角色抽離出來，而是要將蘇聯共黨總書記與總統兩個職務集於一身。¹⁵⁰在這種思路引導下，蘇聯晚期的半總統制得以出現。

在此過程中，首先登場的是1988年6月召開的第十九次全蘇黨代表會議。¹⁵¹此次會議距離1941年的第十八次全蘇黨代表會議已有四十多年，因而備受矚目。戈巴契夫此時已清除了反改革與激進改革的兩方面反對力量，因此提出了其所倡議的改革計畫，包括中央委員會委員由競爭性選舉產生等。同時繼續其在1986年蘇共第廿七次代表大會時即提出的黨政分工思想，進一步強調「恢復蘇維埃的全權」，黨的政治方針應通過在國家、機關中工作的黨員貫徹執行，不能對國家機關作直接指示。為了提升「蘇維埃」面對行政部門（executive assembly）時的聲望，他建議各級行政區域的黨的第一書記應被選為同級蘇維埃的主席，同時蘇維埃的主席也要被賦予一定的行政權力。倘若黨的第一書記未能在包含了非共人士的蘇維埃當中被選為主席，那麼蘇共應該撤換其第一書記，而這就意味了非共人士對黨的領導人具有選擇的權力。同時，這種作法似乎又使得國家與黨的關係更為緊密，而與戈巴契夫的黨國區分努力頗有不同。不過，藉著這種作法，戈巴契夫可以身兼黨總書記與改革後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仍可掌握權力與「重建」的方向。¹⁵²

會議的討論非常激烈，但通過成立一個包含立法與監督力量的議會「人民代

¹⁴⁹ 佩特羅夫，*戈爾巴喬夫現象*，頁192。

¹⁵⁰ 普里馬科夫，*大政治年代*，頁55-56。

¹⁵¹ 「代表會議」（Party Conference）和「代表大會」（congress）的區別，在於代表會議主要用已發揚辯論及交換意見的精神，其意涵參閱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154-155。

¹⁵²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65.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149，150，158-160。

表大會」(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¹⁵³成爲蘇聯最高權力機關，推薦黨委第一書記兼任相同層次的蘇維埃主席，以提高蘇維埃的作用；黨委會不再取代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發號施令，並嚴格遵守民主原則、蘇聯憲法和其他法律；規定領導幹部的任期限制爲兩個五年任期，且正式引入了開放、競爭選舉。改革造成原有幹部體制的損毀；各地領導幹部對此多表示猶疑不安，但 1988 年 7 月的中央全會仍將此次大會的結論加以執行。¹⁵⁴

在 1988 年 9 月 30 日開始的蘇共中央全會中，戈巴契夫被提名爲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¹⁵⁵ 1988 年 10 月 1 日舉行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葛羅米科提出退休、辭職，戈巴契夫被選爲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¹⁵⁶但戈巴契夫雖然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權力擴大，但這並沒有更動原來行政部門「部長會議」的結構；因此部長會議主席仍爲行政機關的領導人，「最高蘇維埃主席」與總理成爲最有權力的兩個職位。雖然此一承上啓下的制度變革，「伏下了日後俄羅斯聯邦採行雙首長制（半總統制）的根源」。¹⁵⁷

¹⁵³ 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有代表 2250 名，休會期間的常設機關是最高蘇維埃；最高蘇維埃分成聯盟院和民族院，各 271 人，每年兩次會期各三到四個月。參閱劉明哲，**俄羅斯國家杜馬運作之研究：1993 年 12 月---1996 年 6 月**（台北：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6 年 12 月）；轉引自：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台北：五南，2000 年），頁 67，68。

¹⁵⁴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66-71.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58。不過此時的競爭選舉還不允許反對黨成立，而是讓共產黨、共青團、工會等「社會組織」提名，實際上爲「一黨多元主義」，參閱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台北：東大，民 84），頁 84，85。

¹⁵⁵ 會議通過決議，擴大中央委員會的各委員會的權力、在中央委員會下成立了黨建、意識形態、經濟、國際、法律、農業共六個委員會、降低了中央書記處的權力，並撤換了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葛羅米科等五人。此次會議之後，政治局的開會次數也逐漸減少，中央書記處事實上停擺；這樣雖然強化了戈巴契夫的權力，但從 1988 年中以來激進化的改革措施引起的領導層保守勢力的反彈並未因此消弭，雙方的衝突進一步加深，參閱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p. 76, 77.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92；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五分冊），頁 158，159。新成的的蘇共中央六個委員會的細節，可參閱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62 表。此時的戈巴契夫，已開始擔心自己像赫魯雪夫一樣被剝奪權力，因此急於進一步掌握權力，但這種作法卻只是進一步損害其威信，參閱多勃雷寧，**信賴**，頁 721。同時戈巴契夫的另一個抓權步驟，是在 1988 年十月將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加以調整，十一月的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新的中央書記處的組成方案；參閱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72。

¹⁵⁶ 於是此後即便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也不能解除戈巴契夫的職務、剝奪他的權力。參閱多勃雷寧，**信賴**，頁 716。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五分冊），頁 159，160。

¹⁵⁷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頁 68。

二、蘇聯半總統制的形成

在戈巴契夫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之後，蘇聯領導體制重新回到典型二元領導體制。但最高蘇維埃仍然僅是一個議會；戈巴契夫將最高決策機構從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轉移到最高蘇維埃，雖然使最高蘇維埃地位上升，但其決策卻受到更多制約，也使其進一步推動「總統制」，也進一步遠離了原蘇聯的決策體制。¹⁵⁸由於國家機關的權力取代了相對不受監督的書記處，因此可說蘇聯開始逐步實施「憲政」，¹⁵⁹但改革很快就被分離主義所擊潰，蘇聯分崩離析。

1989年3月「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使激進改革的聲浪進一步擴散到群眾當中，領導層更加難以掌控局勢。雖然多數當選的人民代表仍是共產黨員，但許多重要人物，例如莫斯科、列寧格勒與基輔等許多重要城市的領導人，在這場競爭選舉中卻都落選了；自行參選的葉爾欽卻贏得高票。¹⁶⁰在1989年4月5日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對此進行了討論，除了對改革方針的質疑，也對領導人在選舉過程中的無所作為表示了不滿。戈巴契夫則讓110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和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退休辭職，進一步消除了可能抵制和反對戈巴契夫改革路線的潛在力量。¹⁶¹然而現實是此時改革已經失去控制。¹⁶²當時的形勢，可由戈巴契夫自己的一段話來加以理解：¹⁶³

¹⁵⁸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五分冊），頁 669。到蘇聯晚期，戈巴契夫在「新思維」的鼓舞下，其施政方式愈來愈繞開傳統的政策制定機構，越來越多由自己做出重大決定，因此開始走向實質上的「帝制統治」。甚至連允許「德國統一」都自作主張，未先徵得政治局的同意，參閱多勃雷寧，**信賴**，頁 711-714。

¹⁵⁹ Sharlet, *Soviet Constitutional Crisis*, p. 98.

¹⁶⁰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78.

¹⁶¹ 到1989年9月9至20日的蘇共中央全會，戈巴契夫又解除了幾位較為傳統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參閱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p. 80-83. 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92。

¹⁶² 隨著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的，是之後在黨內出現的派系分化；1989年4月「民主論壇」（Democratic Platform）開始串連黨內的改革派，隨後對改革方式存有疑慮但希望有所作為的黨員也開始組織「馬克思主義論壇」（Marxist Platform）。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p. 122-125.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72。兩派或翻譯為「民主綱領派」與「馬克思主義綱領派」，並認為兩派的活動是從1990年二月全會前後開始，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94。對於戈巴契夫此時期的無所作為，也有學者批評其為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國家領導人。佩特羅夫，**戈爾巴喬夫現象**，頁 212。

¹⁶³ 戈巴契夫，**我的 72 小時**（台北：時報文化，1991年），頁 126, 127。

最初，「重建」即由一群重要部門的知識份子所支持。但在自由開放的情況下，知識份子立即轉為激進。他們許多人快速的進入反對派陣營中，對時政加以攻擊，企圖使之解體；因為國家的領導者沒有照他們的話去做，領導者不能滿足某一個或某一群知識份子，均會招致嚴厲批評。最徹底激進的知識份子，有時會忘了事情的本源，當他們思及過往所遭受的悲慘經驗時，他們開始要求每件惡事均應毀棄，直到根本，方乃罷休；事實上，布爾什維克已被定罪詛咒。知識界中這種門戶派別及偏狹心態，目前經由各種新、舊傳播媒體及反映管道，擴散到蘇聯的整個社會中，其經常以一種裝飾著歇斯底里及狂亂的扭曲形式顯現，社會真相正被耗盡。我認為，這不只是一個充滿了問題的時代，也是一個混亂騷動的時代。人們自各方面尋求出口以解決困境，某些人提議政府全面復辟，回復到沙皇時代的君主政體；有些人則冀求精神性靈的復活，他們只從宗教上去尋求認同，同時將大眾及個人道德的提升，全數寄望於教會身上，使得教會獨攬人民性靈的生殺大權；也有人希望資本主義體系能以它「純粹的形式」強行介入，但這些人卻未考慮到這個突如其來的轉變是否適合蘇聯。

在這樣日趨混亂的情況下，1989年5月25日至6月9日，第一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選出戈巴契夫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為第一副主席，雷日科夫為部長會議主席，並選出了「最高蘇維埃」的542位代表。¹⁶⁴雖然藉由公開化、以及修憲、強化最高蘇維埃主席的權力，戈巴契夫此時已不受共黨內部的制肘，但當年下半，戈巴契夫感到此一最高蘇維埃主席的職務，仍不足以應對經濟與種族問題的混亂失序，與議會內層出不窮的權力要求，因此在放棄以共黨組織作為其權力的基礎後，他再度放棄以議會為權力基礎，而期望透過再

¹⁶⁴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五分冊），頁 190-196。此一人民代表大會與最高蘇維埃的代表雖然多為共產黨員，但卻成爲一個傾向於挑戰領導人的議會，參閱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85.

次修憲，增加行政總統制度，擴大其權力。¹⁶⁵

1990年二月的中央全會，出現批評戈巴契夫「個人專權」的言論，總理雷日科夫不僅聲望上升，且刻意與戈巴契夫保持距離。但此次全會還是通過了確立多黨制、取消一黨專政的決議，並提名戈巴契夫為蘇聯「總統」。2月27日最高蘇維埃通過憲法修正案，決議實行總統制。3月12日召開非常人民代表大會，13日人民代表大會以1542票贊成、368票反對、76票棄權，通過憲法修正案。3月15日戈巴契夫以1329票贊成、495票反對、54票棄權，被人民代表大會選為蘇聯總統。之後，又以1202票對682票，選舉盧基揚諾夫成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然而會議上戈巴契夫對反對派的忍讓，使總理雷日科夫以及許多代表感到極為不滿。¹⁶⁶

此時蘇聯的部長會議仍然存在，總統與部長會議主席的行政權力分割不清，因此是「半總統制」。¹⁶⁷但無論如何，作為國家武裝力量最高總司令、國防委員會主席、蘇聯總統的戈巴契夫，¹⁶⁸所實行的總統制，已「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總統制，而是美國、法國式的總統制，其實質是進一步剝奪共產黨的領導權，使總統個人取代蘇共中央成為國家大事的決策者」。因此自蘇聯實施總統制後，蘇共中央便喪失了一切權力，而以蘇共中央總書記身份出任總統的戈巴契夫也不再受共產黨的制約。¹⁶⁹

1990年7月2日召開蘇共的二十八大。這次大會大幅改變了蘇共的中央體制，包括由黨代表大會直接選舉總書記與新的「副總書記」一職，中央書記處由

¹⁶⁵ Ahdieh, *Russia'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 29.

¹⁶⁶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p. 94, 108.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168，169。資中筠主編，*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啓示錄（下卷）*，頁86。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70年（第五分冊）*，頁358-363，365。1990年1月的蘇共領導人名單，可參見 Stephen White, Alex Pravda and Zvi Gilelman ed., *Developments in Soviet Politics* (Hampshire: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90), p. 56.

¹⁶⁷ 此處半總統制，學者亦稱之為「半實位總統制」；資中筠主編，*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啓示錄（下卷）*，頁92。

¹⁶⁸ 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360。

¹⁶⁹ 後來戈巴契夫便利用總統職權解散蘇共組織，停止蘇共活動，沒收蘇共財產。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191。但也有學者認為，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擔任總統職位，原本可以強化黨的地位，只是由於戈巴契夫自身以及葉爾欽的因素，此種體制設計沒能達到其目標。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165.

「副總書記」領導，以讓兼任蘇聯總統的總書記能專心國事，且改變了政治局的組成，讓 15 個加盟共和國的黨書記都成為政治局的委員。由於政治局的多數成員分佈全蘇聯各地，政治局已難以發揮議事的功能，中央書記處的權力因此上升。同時，雖然會上否決了中央委員會關於建立「黨主席」制的提議，但由於政治局中擔任蘇聯政府領導人的幾乎僅剩戈巴契夫一人，加上政治局議事功能降低，因此使「黨政分開」更容易實現。新的黨章又授權各加盟共和國的共黨中央委員會審議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的權力，使蘇共中央權力更形下降；中央政治局可說已喪失了在蘇共黨內扮演一個積極角色的地位。¹⁷⁰此外，本次大會上，蘇共放棄了法定的專政地位，決定推行多黨制和「總統制」，實行三權分立。¹⁷¹

在蘇共二十八會上，雖然會場內外有許多不尋常的現象，¹⁷²但並沒有顯示出蘇聯將要分裂的充分跡象，至少黨內組織仍然健全。但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加契夫、烏克蘭共黨第一書記古連科（S. I. Gurenko）、俄羅斯聯邦共黨第一書記波洛茲科夫（I. K. Polozkov）等均對戈巴契夫大表不滿，憂慮蘇聯的前途。¹⁷³葉爾欽則聲稱其黨員身份將使其無法完全履行其身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職責，因此退出蘇共。「民主論壇」派的黨代表，莫斯科、列寧格勒兩市蘇維埃主席也相繼退黨。¹⁷⁴

二十八會隨後選出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再選出新的政治局委員。原政治局委員僅總書記戈巴契夫與副總書記伊瓦什科連任，其餘 22 位都是新任，其中包括 17 位地方書記。由於擔任地方首長的政治局委員太多，因此政治局就難以開會；同時最高蘇維埃也僅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札索霍夫當選，使蘇聯的決策中

¹⁷⁰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p. 139, 140.

¹⁷¹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50。

¹⁷² 在會議期間，莫斯科出現數千人的反共示威遊行，烏克蘭最高蘇維埃決議召回與會代表，三十萬煤礦工人罷工，且許多黨員在會上宣佈退黨。會議的過程與決議，參閱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70-176。

¹⁷³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71，172。結果李加契夫參加副總書記的競選，但遭到失敗；參閱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五分冊），頁 370-374。

¹⁷⁴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142. 尹慶耀，*蘇維埃帝國的消亡*，頁 174。

心進一步從政治局移向了行政機關。¹⁷⁵

在此時，蘇共的合法性與群眾基礎大幅下降。戈巴契夫的制度權力不斷增加，但所受民眾支持卻不斷減少，1990年6月的黨代表選舉，戈巴契夫在其選區僅獲得61.1%的選票，反對票則多達38.1%。¹⁷⁶同一期間蘇共黨員快速流失，單在1990年上半年即有77萬黨員不再參與黨的活動；全年約減少了180萬。戈巴契夫在1991年7月的中央全會上估計，從1990年到1991年中的18個月，蘇共流失黨員420萬，接近蘇共黨員人數的四分之一。¹⁷⁷

黨的力量消退的同時，「國家」的角色則在上升，各級議會都正常召開，「總統」的權力繼續獲得強化。戈巴契夫在1990年3月被選為蘇聯總統後，1990年9月總統的權力進一步擴張，被賦予以緊急措施「穩定國家社會政治秩序」的權力。「部長會議」被總統任命的內閣取代，進一步強化了「總統」的權力。¹⁷⁸

1990年11月中旬，戈巴契夫做出「實行緊急改組與加強政治結構」的決定，此舉意味其向軍工集團為背景的重工業派靠攏，向保守派立場偏移。1990年12月，蘇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改補充法」，完整授與總統全部的行政權，戈巴契夫權力進一步擴張，並任命新的部長會議主席；此時的部長會議已成為總統的下屬。1991年1月蘇聯軍隊至波羅的海三小國鎮壓獨立運動，顯示戈巴契夫似乎有向「新史達林主義」回歸的跡象，於是戈巴契夫身邊的改革派幕僚紛紛棄他而去。¹⁷⁹

¹⁷⁵ 名單與分析參閱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70年*（第五分冊），頁375，376。

¹⁷⁶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136.

¹⁷⁷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p. 153, 154.

¹⁷⁸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 165. Sharlet, *Soviet Constitutional Crisis*, p. 103. 相關措施包括成立具有顧問性質的「總統委員會」（Presidential Council），這個總統委員會的部分職權涵蓋了蘇共黨的「國防會議」的功能，其成員也包括大多數「國防會議」代表。最高蘇維埃也新設「國防及國家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on Defense and State Security），以議會的角色監督國防預算的使用與國防法規的制訂；為了加強「國防會議」的功能，戈巴契夫增加了其中文職人員的數量，引進重要親信來加以控制。例如把具有國防工業背景的政治局委員查可夫（Lev Zaykov）從莫斯科黨部調到「國防會議」擔任全職副主席，並讓自己的軍事顧問阿若梅耶夫元帥（Marshal Sergey Akhromeyev）在國防會議擔任重要角色。戈巴契夫希望藉此擺脫「國防會議」對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人事依賴，把實權回歸到「最高蘇維埃」（Supreme Soviet）；參閱趙春山，「論轉型階段的俄羅斯軍方角色」，*東亞季刊*（台北），1998年夏，第29卷第3期，頁13。

¹⁷⁹ 資中筠主編，*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啓示錄*（下卷），頁87，93。

1991年3月20日「內閣法」通過，規定蘇聯內閣是執行和發佈命令的機關，隸屬於蘇聯總統；蘇聯內閣對蘇聯總統和最高蘇維埃負責；內閣有權解決蘇聯管轄範圍內的國家管理問題，其決定和命令只能由最高蘇維埃和蘇聯總統廢除；總理人選由總統提名由最高蘇維埃確定；最高蘇維埃和總統可以提出不信任，經過一定法律程序後內閣需辭職。蘇聯政府由部長會議制變成內閣制，權力和法律地位都下降了。¹⁸⁰

雖然名義權力向戈巴契夫集中，但國家形勢更趨紊亂。在此形勢下，保守勢力節節進逼，1991年5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了要求戈巴契夫辭職的提案，雖然未獲通過，但已是公開的挑戰。六月，在1990年底新上任的總理帕夫洛夫，獲得軍方和國安會的支持，提出「政府」有權力在全蘇聯行使特別行政權的提案，試圖架空戈巴契夫，但在戈巴契夫的干擾下未獲最高蘇維埃通過。¹⁸¹

在保守派壓力下，戈巴契夫轉而拉攏激進改革派；先於1991年5月將蘇聯國有的煤礦管轄權轉交葉爾欽，並允許俄羅斯聯邦成立自身的「國安會」組織，並推動名為「蘇維埃主權國家聯盟」的新聯盟條約。¹⁸²但蘇聯副總統、部長會議主席以及其他黨政要員組成的「八人委員會」隨即進行「八一九政變」。¹⁸³

政變結束之後，激進改革派勢力大幅上升，戈巴契夫迫於壓力，與葉爾欽達成協議，准許在緊急狀況下，一方可代替另一方的職務；戈巴契夫並辭去蘇共總書記、宣告蘇共中央委員會解散，並將蘇聯國安會資料轉交俄羅斯聯邦。由於威望已經大受損害，加上蘇聯共產黨被取締，此時戈巴契夫的實質權力已大受影響，乃至於在蘇聯的最後幾個月中，蘇聯任何的重要人事任命，都得徵得葉爾欽

¹⁸⁰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70年**（第五分冊），頁675。

¹⁸¹ 資中筠主編，**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啓示錄**（下卷），頁88，99。

¹⁸² 資中筠主編，**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啓示錄**（下卷），頁88-90，98，99。

¹⁸³ 政變失敗的原因，被歸納出四項：一、發動政變者準備不週且不果斷，既未能使國安會與軍方對其效忠、又誤判了社會的民主化氣氛。二、葉爾欽（Boris N. Yeltsin）所領導的民主反對派有效組織了反政變的力量。三、駐紮在莫斯科的軍隊不願意對抗民選的葉爾欽。四、國際的強烈譴責。其中，軍隊的分裂倒戈最具關鍵性的影響；包括莫斯科軍區的三個師中的兩個師倒向了葉爾欽，從圖拉調來的空降部隊也反過來保衛葉爾欽，蘇軍總參謀長莫伊謝夫（Mikhail A. Moiseev）與空軍司令沙波什尼科夫（Yevgenz Shaposhnikov）也都不支持政變、仍擁護戈巴契夫；由此顯現出軍隊不干政的歷史傳統，在政局動盪時的作用。趙春山，「論轉型階段的俄羅斯軍方角色」，頁17，18。

的同意。11月15日，葉爾欽取消了蘇聯政府的約八十個部委機關，以進一步推進改革。再不久的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國成立新的獨立國家聯合體，戈巴契夫也於25日宣告蘇聯的正式瓦解。¹⁸⁴

三、俄羅斯半總統制的形成

蘇聯憲法規定，蘇聯修憲之後，各加盟共和國的憲法應自行隨之修訂。因此蘇聯憲法的變動，適所必然的使俄羅斯的憲法跟著修正；1924年蘇聯憲法頒佈後，俄國在1925年頒佈新憲法；1936年史達林憲法頒佈後，1937年俄國再度頒佈新憲法；而1977年布里茲涅夫再度頒佈新蘇聯憲法之後，1978年俄羅斯也再度通過了新憲法。¹⁸⁵

在前述戈巴契夫進行政治改革的時候，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也都受到影響，而採取了相應的行動。¹⁸⁶繼蘇聯的人民代表大會在1989年選出後，各加盟共和國的人民代表大會也在1990年選出，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的1068位成員，即在1990年3月選舉產生。¹⁸⁷

當時由於各地分離傾向的加劇，俄羅斯民眾也產生了逆反心態，覺得也有權力先滿足自身的權力，在俄羅斯民眾與基層黨員的訴求下，原本直屬蘇聯共黨的俄羅斯各地區共黨，也重組為「俄羅斯聯邦共產黨」。葉爾欽則先奪取了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領導職務，後又被俄羅斯人民直選為俄羅斯第一任總統。由於俄羅斯在蘇聯的經濟與政治地位，於是自此蘇聯事實上出現了「兩個中央」；戈巴契

¹⁸⁴ 例如1991年9月戈巴契夫要任命普里馬科夫為對外情報局（當年底蘇聯從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分離出來的新單位）的領導人，但正式任命得經過葉爾欽的同意。普里馬科夫，*大政治年代*，頁92。資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啓示錄（下卷）*，頁88-90，98，99。

¹⁸⁵ 劉向文，*俄國政府與政治*，頁1-18。

¹⁸⁶ 在1990年1月至1990年10月間，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都經其議會選出了各自的「總統」；而從1990年10月到1991年12月，其中的12個總統又經過人民的普選程序。參見David C. Brooker, "Founding Presidents of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A Comparative Study," *Demokratizatsiya –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vol. 12, no. 1, winter 2004, p. 134.

¹⁸⁷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頁68，69。在此之前，隨著各地分離主義的加劇，在俄羅斯建立一個「適當的領導機關」的建議已在1990年2月的中央全會中通過，參閱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p. 94, 108.

夫與葉爾欽之間的摩擦，以及雙方支持者之間的分歧，使雙方關係更趨於衝突；在此過程中，由於戈巴契夫未能改善經濟、凝聚各蘇聯加盟國的向心力，於是葉爾欽的實質權力，也愈來愈高。¹⁸⁸

在 1990 年 5 月下旬，經過三輪投票，葉爾欽被選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6 月中並選出席拉也夫（西拉耶夫，Ivan Silaev）為部長會議主席（總理）。此時一方面由於俄國還未脫離蘇聯，加上部長會議掌握行政權，共黨勢力依然龐大，因此葉爾欽的權力受到很大限制。然而此時蘇聯已經再度修憲，改為總統制，因此葉爾欽為了增加合法性和權威，隨之推動俄羅斯設置實權總統，並且主張以直選產生；此一訴求在 1991 年 3 月的公民投票中通過，於是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在 1991 年 5 月修憲，將總統職務與「最高蘇維埃主席」職務區隔開來。1991 年 6 月 12 日，葉爾欽在選舉中擊敗了共產黨的候選人，成為經由直選產生的俄羅斯總統。這一過程不僅使蘇聯共黨的地位大受打擊，¹⁸⁹也使葉爾欽獲得了比戈巴契夫更直接的民意支持。

在成為實權總統之後，葉爾欽得以憑藉其權威影響俄羅斯的部長會議；但由於總攬行政的部長會議主席一職仍然存在，加上俄羅斯國會（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的權力意識大為增加，行政權的歸屬漸成問題，「半總統制」的格局隱然成形。¹⁹⁰

當時俄國各部依然聽命於部長會議主席，葉爾欽雖然成立「國務會議」和「聯邦會議」，希望能夠分「部長會議」之權，卻效果有限。但「八一九政變」後，葉爾欽聲望大增，且俄羅斯國會也以戈巴契夫和蘇聯中央為對手。因此 1991 年 11 月，當葉爾欽以推動市場經濟必須掌握權力為藉口，表示希望兼任總理一職時，國會雖有非議，仍予以同意。但在 12 月 8 日葉爾欽和烏克蘭、白俄羅斯領

¹⁸⁸ 普里馬科夫，*大政治年代*，頁 65-66。此時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中央總書記是「穩健派」的波茲洛科夫；學者認為激進派的葉爾欽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而穩健派握有「俄共」黨權，因此戈巴契夫仍有運作空間；參閱資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啓示錄（下卷）*，頁 86。

¹⁸⁹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Party System*, pp. 165, 166. 佩特羅夫，*戈爾巴喬夫現象*，頁 345。Holmes, *Post-Communism*, p. 175.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頁 69。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五分冊）*，頁 392-397，465，466。

¹⁹⁰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頁 69。

導人宣佈解散蘇聯，並在年底使戈巴契夫宣佈辭職之後，葉爾欽突然發覺過去的支持者開始轉而反抗他；葉爾欽與國會「人代會」的衝突，開始逐漸醞釀。

當時葉爾欽似乎有能力將蘇聯時代選舉的人民代表大會廢除，訂立一個全新的憲法；但由於葉爾欽和國會仍處於蜜月階段，葉爾欽又以經濟改革為第一優先，於是就滿足於一年的「獨裁」權力，蘇聯時期的憲政架構也因此得以延續。¹⁹¹因此雖然蘇聯瓦解，俄羅斯以一個民主國家的形式獨立，但新生的俄羅斯在體制上繼承了兩個原蘇聯時代的遺產；首先是包含超級總統制特徵的體制架構，其次是全面轉軌中的不穩定政治與經濟形勢。後者又使前者先天具有的威權主義特徵更加突出。

1992 年時，蘇聯國會已經轉而強調其民族主義，並且反對激進經濟改革；經濟改革的意識形態由自由主義轉為強調平等的民眾主義（平民主義），並且為新的威權體制做好準備。¹⁹²

1992 年 1 月，國會同意副總理蓋達 (Yegor Gaidar) 的激進改革計畫。到 1992 年 4 月，「人代會」感到不能讓葉爾欽為所欲為，乃希望能迫使葉爾欽放棄總理一職，並將經濟的權力交給蓋達，僅維持葉爾欽對安全事務、外交與國防的權力。¹⁹³然而雖然此時 1060 位人代會代表中，明確支持葉爾欽的不過兩三百人，且有三分之一強烈反對他，但葉爾欽仍與各派達成協議，以超過代表總數一半的過半票數支持，再兼任了三個月總理職務。五月份最高蘇維埃與政府的關係再次緊張，政府大幅改組；¹⁹⁴葉爾欽也放棄兼任兩個月的國防部長職位，5 月 18 日任命格拉契夫 (Pavel Grachev) 為國防部長。¹⁹⁵在國會壓力下，葉爾欽在六月派任

¹⁹¹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頁 72。

¹⁹² 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286。

¹⁹³ Holmes, *Post-Communism*, p. 176.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頁 70，71。

¹⁹⁴ 馮紹雷，**制度變遷與對外關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8，9。

¹⁹⁵ 蘇聯瓦解為「獨聯體」之後，俄國原本無意成立自身的武裝力量，而希望維持統一的「獨聯體」，但到 1992 年春，俄羅斯面對各獨聯體國家紛紛獨立建軍的現實，放棄了不獨自建軍的立場。1992 年 3 月 16 日，葉爾欽簽署了組建俄羅斯國防部的命令，並代理國防部長一職。之後俄羅斯逐步接管了原蘇聯軍隊中以俄羅斯人為主的部隊；6 月 26 日俄羅斯議會通過了「俄羅斯聯邦國防法草案」，新的俄羅斯軍隊的組織規程進一步成形。然而，由於處於制度轉型時期，權力分配頗有不明，因此在總理、部會、「國家安全會議」與總統四者之間，仍未能明確對「國家安

了齊諾梅爾金（Viktor Chernomyrdin）等三人為副總理，削弱了蓋達的權力。同月葉爾欽又任命蓋達為代理總理。到 12 月，葉爾欽任命蓋達為總理的提議在國會被否決，葉爾欽不得已乃任命齊諾梅爾金為總理，以與國會妥協。¹⁹⁶

1993 年葉爾欽與國會衝突更趨激烈，四月公投、六月制憲會議，都顯示府會雙方的權力之爭。¹⁹⁷ 逐漸地葉爾欽甚至對國會通過的法律拒不服從，反而靠命令統治，最終在 9 月 21 日「解散」了俄國從蘇維埃繼承下來的「代表大會」，國會對此的反應是任命副總統魯茲科依（Aleksandr Rutskoi）代理總統職權，後並任命為總統。葉爾欽的回應則是在 10 月 4 日下令坦克向國會砲擊。¹⁹⁸

十月事件之後，一方面，葉爾欽在 1993 年 12 月透過公民投票制定新憲。新憲法沒有副總統一職，「總理」仍稱為「聯邦政府主席」，仍然有兩院制國會，總統仍為三軍統帥、決定大政方針、主持聯邦安全會議，並提名聯邦政府主席，¹⁹⁹ 因此繼承原體制的部分，仍遠大於變化的地方。²⁰⁰ 但此一憲法擴大了總統的實質權力，創造了一個非常有利於總統的憲政體制。

在此一新憲法下，總統可以經過國會同意後任命聯邦政府主席（第 111 條第 1 項），並解散內閣（第 117 條第 2 項），在總統與國會形成僵局的情況下，例如在國會三次不通過總統所提總理人選時（第 111 條第 4 項），或國會在三個月內

全」相關問題的權責。趙春山，「論轉型階段的俄羅斯軍方角色」，頁 18，19，25，26。

¹⁹⁶ 參閱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頁 73，74。馮紹雷，**制度變遷與對外關係**，頁 21，22。

¹⁹⁷ 細節參閱馮紹雷，**制度變遷與對外關係**，頁 24-27。

¹⁹⁸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頁 74。有學者認為國會的失敗是由於其過於天真、相信「法律」；例如國會的反對派領導人魯茲科依向支持國會的民眾宣稱「勝利的唯一機會……只能是來自法律，而不是法律之外的任何東西」；參閱佩特羅夫，**戈爾巴喬夫現象**，頁 348。

¹⁹⁹ 吳東野，「『半總統制』政府體系的理論與實際」，**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35 卷第 8 期（民 85 年 8 月），頁 46，47。

²⁰⁰ 葉爾欽在 1993 年夏的制憲大會的開幕講詞中曾經強調，俄羅斯政府草擬的憲法，將避免模仿美國、法國、或其他國家，而必須同時顧及俄羅斯的政治傳統與全球國家的民主發展經驗。參閱吳東野，「『半總統制』政府體系的理論與實際」，頁 46。此外，1996 年時的民調，當問及當時體制與共黨舊體制相比如何時，42% 的俄國人認為共黨舊體制較好；另一項調查中，也有 35% 支持共黨體制，32% 支持強人政治，雖然仍有 45% 的民眾反對軍隊統治、共黨體制或強人政治。這一定程度反映了俄國人身對其國家定位與現實落差的不滿，並肯定前蘇聯時期的制度。此種態度也使俄國體制繼承原蘇聯體制時，具有一定的群眾基礎。Richard Ros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n Stephen White, Judy Batt, and Paul G. Lewis ed., *Developments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88-291. 另可參閱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頁 77-86。

兩度對政府投不信任票時（第 117 條第 3 項），或總理主動提出信任案而被國會拒絕通過時（第 117 條第 4 項），總統都可以解散國會（杜馬）。這些條款使俄羅斯的體制成為前述具有超級總統制意涵的半總統制，於是葉爾欽乃能以這些條款壓迫國會，通過其人事任命案。²⁰¹

1993 年底的新憲法，形成了一個以權威主義為內核的政治架構。轉型期政治穩定的要求，加上俄羅斯政治傳統的催化，使權威主義政治路線能夠在代議民主制的形式下保持很強的潛能。但新憲法通過後，俄國的國會選舉仍然選出一個反對葉爾欽的國會，於是新憲法仍無法化解府（總統）會（國會）爭議，贊成和反對資本主義的勢力又分據府會權力兩端，因此新憲法通過後，仍無法維持政治的穩定，只是讓國會對行政力量的干擾作用降低而已。²⁰²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雖然總統的權力擴大，但「總理」切爾諾梅爾金以其代表「中間派」，也能夠掌握相當大的權力；十月事件發生時，軍隊曾要求葉爾欽保證任用切爾諾梅爾金作為葉爾欽出現意外時的繼承人，十月事件之後，切爾諾梅爾金也可以單獨會見軍方高級將領，在外交上提出與葉爾欽不同的意見。²⁰³ 由此可見雖然憲法的規定近於超級總統制，但沒有讓俄國成為單一領導體制，而仍具有「二元領導」的半總統制意涵。

其後數年，俄國仍多次出現半總統制下的府會爭議。學者認為，化解此種府會衝突的途徑，就是總統和國會多數黨同屬一個黨派，在此狀況下，二者可以透過黨內的協調機制來維持和諧。²⁰⁴ 俄國激進的民主化過程，使多黨林立，也使繼承自共黨統治時期「二元領導體制」，在民主化過程中反而演變為具有超級總統制特徵的半總統制。但不同的民主化過程，或許會使半總統制的演變方向，有所不同？

²⁰¹ 吳東野，「『半總統制』政府體系的理論與實際」，頁 46、47。相關憲法條文，參閱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innish Lawyers' Publishing, 1994), pp. 26-36.

²⁰² Holmes, *Post-Communism*, pp. 177, 178.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頁 37、78、90、91。高朗，「評析威權轉型的總統權力」，*美歐季刊*（台北），第 12 卷第 4 期（民國 86 年冬），頁 16。馮紹雷，*制度變遷與對外關係*，頁 4。

²⁰³ 馮紹雷，*制度變遷與對外關係*，頁 28-32。

²⁰⁴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頁 82。

第四節 結語

上述蘇聯權力交替的歷史，令人咀嚼再三。列寧「不以正取」，用少數自命正義的「先鋒隊」進行政變，這雖然讓布爾什維克獲得權力，但「少數執政」的陰影一開始就暗含了錯誤路線、暴力鎮壓，這都使蘇聯的建立先天不良。列寧在內戰後期開始推動「新經濟政策」，但黨內民主程序未能真正建立起來；而列寧「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身影，對其近半個世紀的蘇聯領導人而言，似乎也具有模仿的效果。

史達林開創了「總書記」成為領導人的先例。不過若說此時或今後的蘇聯領導人就是「總書記」，則言之過早。²⁰⁵行政部門還是依據「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命令運轉，因此當 1941 年德軍東侵，史達林也就順勢以總書記身份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與總理（人民委員會主席、部長會議主席）。其後史達林基本上是以「總理」的身份統治國家，以致於 1952 年廢除了總書記之職，改成第一書記。

一般談論蘇聯領導人，都忽略了馬林科夫。但 1953 年史達林死後，由於「第一書記」之職似乎並不重要，此時蘇聯的領導人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在赫魯雪夫的反風攻擊下，馬林科夫辭去了部長會議主席，由布爾加寧接任；雖然如此，在處理國際外交事宜時，赫魯雪夫也仍須與布爾加寧合作，並無專斷之權。體制權力主要還是在部長會議，因此當 1957 年的鬥爭之後，赫魯雪夫只好接任部長會議主席之職，以免黨、政兩大權力系統再生齟齬。

權力的集中引來分權的反動。史達林的集中，造成其後的「批史」；赫魯雪夫的權力集中與幹部改革，則促成制度化的權力分享以及幹部穩定政策。²⁰⁶從布

²⁰⁵ 一般認為，總書記是共黨國家政治的重心，總書記是否兼任總理或其他職務並不重要；筆者觀點與此略有差異。參閱 Hazan, *From Brezhnev to Gorbachev*, pp. 4-5.

²⁰⁶ 不准許黨書記再兼任總理、政治局成員權力的增加與制度化的權力分配，都使赫魯雪夫之後的黨書記權力備受限制。參閱 Stephen White, "The Soviet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Soviet Power," pp. 50-65.

里茲涅夫開始，蘇聯總書記不再兼任政府首腦，柯錫金穩穩佔住了部長會議主席之職；在其初期，甚至與總書記平起平坐。此種分權再經過十餘年的醞釀，演變出總書記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的結果。²⁰⁷由此刻開始，蘇聯的名義國家元首不再無足輕重，國家名義最高領導人與黨的最高領導人的重合，加上負責行政的部長會議主席，形成了國家領導人與政府領導人的「二元領導模式」。

然而布里茲涅夫時代又是一個「唯唯諾諾、平平庸庸的幹部」大行其道、並且官官相護、乃至於無可改革的時代。²⁰⁸推翻赫魯雪夫的和平宮廷政變，顯示了上層共黨官僚的利益，因此其後的蘇聯的「改革」就愈來愈難以進行。到柯錫金去職後，新任部長會議主席完全喪失了制衡總書記的權威。布里茲涅夫維持了領導職務終身制，使他終於成為事實上的單一領導人，但終身制也使得「扶上馬、送一程」的交接期不至於出現，維持了職務分配形式上的穩定性。

安德洛波夫與契爾年科的兩任短暫領導，雖然顯示出總書記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慣性，但契爾年科的干擾，可以讓安德洛波夫接任元首之職延宕半年之久；而契爾年科本人則可以在接任元首職務不到一年之後，又放棄此一職務，私相授受給葛羅米科；戈巴契夫則為了在政治局的角力中贏得總書記一職，再度私相授受國家元首一職。此種種作為，都顯示蘇聯領導層制度化之脆弱。而此種脆弱，又是與其封閉僵化的體制分不開的。

戈巴契夫上臺之後厲行改革，開放與重建成為新的國策。老人盤據的政治局很快就一敗塗地，各地黨務與行政機關的老人政治也被強烈撼動。一方面是人心思變，一方面是官僚的惶恐不安。過於急促的改革未收其利先受其害，許多新任官僚雖然口舌便給但並非實幹之才，原已鏽蝕鬆動的生產環節此刻反而開始斷裂。改革不能中途而廢，但戈巴契夫也不知從何著手，只能先攬權以自保。

²⁰⁷ 葉自成，**俄羅斯政府與政治**，頁 76。

²⁰⁸ 由於使能提出不同意見或新的思想觀點者容易被撤職或「清洗」，因此蘇聯容易培養出「唯唯諾諾、平平庸庸的幹部」；參閱陸南泉等，**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頁 113。

原本政治局的同僚、特別是部長會議主席，應該要發揮制衡的作用；但戈巴契夫卻能不斷用其魅力與口才，以及嶄新的口號說服同志。同時戈巴契夫認為執政失敗的原因不是自己的過失，而是其他人不能有效的行動，因此就頻繁地撤換各級幹部。²⁰⁹其後戈巴契夫獲得最高蘇維埃主席職務，乃至於其後的總統職務後，黨內同僚對其制衡作用更為降低；最終其同僚乃以非常手段欲將之去職，卻反而加速蘇聯之崩解。

在此過程中，戈巴契夫未能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一職，也未能將此一職務的制度意涵加以改變，僅試圖擴大國家元首應對緊急狀況時的權力；這種與史達林及赫魯雪夫不同的作法，顯然受到 1965 年宮廷政變之後的分權規定，以及 1977 年的修憲結果的影響。國家元首逐漸具有實權，而總理仍是行政部門首長，終於形成總統與總理分權的體制，埋下了日後俄羅斯聯邦採行半總統制的根源。

在蘇聯的領導政治上，比較傳統的看法認為，集體領導不過是發生在繼承過程中的一個暫時現象；當繼承問題解決之後，獨裁者便理所當然的產生了。回顧此一歷程，我們可以認為此說有其正確之處，亦有其不足。「獨裁」就其原始意涵而言，本就是為應付非常時期而產生，革命初期的動盪需要獨裁、外敵入侵需要獨裁，「改革」帶來的動盪鼓勵了獨裁，但承平時期的難以進行獨裁，也不需要獨裁。於是原本的獨裁者可能想降低自己的工作量，分享權力；新的領導集體更會強調權力分享的必要性。

邢廣程概括蘇聯領導人對權力的態度，認為「在列寧看來，黨的最高領袖兼任國家或政府的首腦職務，是為了使黨和政府更加協調、更有效率」，「史達林兼任政府首腦和軍隊首腦，則是為了掌握更多的權力，通過政府系統會更有效地推動行政命令體制的運轉」，「赫魯雪夫任部長會議主席則是為了更快地實現其冒進

²⁰⁹ 在戈巴契夫的六年任期內，更換了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三位總理，部長會議主席團所有成員和各部部長。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也先後由三人擔任，即葛羅米科，戈巴契夫與盧基揚諾夫；參閱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頁 408。

計畫」，「布里茲涅夫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是爲了使自己『直接處理國內外的事務』時『得到理所當然的明文規定』」，「戈巴契夫兼任國家首腦，是準備通過此舉提高蘇維埃的威信，使管理國家的權力重心真正移到蘇維埃系統中來」。²¹⁰

邢廣程對蘇聯領導人的評價，恰可與二元領導體制的產生原因相呼應。我們可以將之作爲本章結語的參考。

首先，黨書記兼任總理，是「爲了使黨和政府更加協調、更有效率」、以「更有效地推動行政命令體制的運轉」，但這就意味了權力的高度集中。列寧身爲人民委員會主席，面對內戰需集中權力；二次世界大戰，更促成史達林擔任總理職務。此外，蘇聯早期領導人不以國家元首身份操控政局的原因，則可能還要追溯歐洲各國在十九世紀晚期的君主與首相分權的二元領導體制。

其次，當外無立即威脅、內則強人去世，新一代政治菁英必然反對權力集中於某一同儕，而強調權力分享、乃至於權力制衡，於是會逐漸演變出二元領導體制，藉由行政分權來削弱過於強勢的單一領導人的出現可能性。這種分享的結果雖然可能降低行政效率，²¹¹但在共黨國家，恐亦難以期待其他方式可以制衡掌握行政權的黨書記。

其三，蘇共的歷任黨書記，例如史達林、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等，都傾向於自己掌握外交權力；在單一領導下此點固屬無庸置疑，在集體或二元領導的情況下，黨書記掌握外交權力，更是顯現其爲國家領導人的必要之舉，同時這也顯示出一種「世俗化」的權力分配傾向。²¹²

其四，當黨書記爲了「使自己『直接處理國內外的事務』時『得到理所當然的明文規定』」，並且「提高蘇維埃的威信」而兼任國家元首職務，典型的共黨二元領導體制就誕生了。

其五，共黨國家的二元領導雖然可以維持領導人之間的某種權力平衡，但黨

²¹⁰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 70 年**（第五分冊），頁 693。

²¹¹ 但西方的三權分立也可能導致此種結果。

²¹² 參閱 Archie Brown, "The Power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SU," p. 145.

書記長期掌權之後，仍能藉由不斷安排派系人事，強化自身的領導權威，從而在實質上使二元領導體制徒負虛名。因此限制領導人任期，對於鞏固二元領導體制亦極為必要。

其六，共黨國家的計畫經濟體制的固有弊病，使其在與市場經濟國家的競爭中落居下風，因此共黨國家必然有經濟體制改革的壓力，並且必然促使其採取政治改革，這些改革壓力會對二元領導體制構成影響。若改革成功，寡頭的集體領導會以二元領導的形式進一步鞏固；但若在此過程中出現危機，又會使體制倒退為強人政治。

最後，共黨國家形成二元領導體制之後，若遇到新的緊急狀況，需要權力的集中，黨書記也難以重新兼任「總理」職務，因此只能強調「使管理國家的權力重心真正移到蘇維埃系統」，亦即黨書記之手。這顯示出制度的「鎖定」（locking in）效果，一旦形成，就會傾向於不斷強化。

